

第 四 辑 目 录

- 忠于历史 开拓向前……………官本欣 (1)
- 抗战时期的彭晓林同志……………陈 英 (5)
- 奔赴延安抗大……………李全恩 (13)
- 刘邓大军军械工作回忆片断
……………任 英 杨志高 (26)
- 解放鱼山……………史 光 (41)
- 抗日时期的东阿公安局……………李建民 (53)
- 抗日战争时期我县对敌斗争中的
敌伪工作……………朱成震 (60)
- 献石修堤战顽敌……………汪雨亭 (74)
- 刘海涛传……………文史科 (81)
- 解承生烈士……………贾兴强 (95)
- 谈古论今话邮电……………王俊才 (105)
- 烟香飘逸吕营村……………刘永禹 (133)
- 东阿私营药业大观……………张连启 (137)
- 东阿方志述略……………王桂云 (149)

忠于历史 开拓向前

中共东阿县委书记 宫本欣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服务当今，惠及后世。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地方性的文史资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可为改革开放提供借鉴，进行超前研究；还可作为乡土教材，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能补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周恩来同志生前倡建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现已繁花似锦，万紫千红，已经和正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进一步搞好文史资料工作，是各级人民政协光荣的历史职责。

东阿地处黄河之滨，齐鲁故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渊远流长。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历史踪迹浩如烟海，英雄名人灿若繁星。阿胶宝蜚声中外，曹植墓名贯古今。清末民国以来，更是农民起义英雄的故乡，革命爱国志士的摇篮。东阿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开拓，谱写了无数光辉的篇章。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政通人和。我县的文史资料，广征有物，博采有人。盛世修史，光昭日月。古云：“亡史甚于亡国”，“国亡可复，史亡无救”。由于战乱和其他历史原因，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尚未得到征集整理。不少知情人已长眠地下，尚存者也年事已高，面临人去史亡的严峻局面。抢救资料，刻不容缓。我县各级党委、政府、老干部和台胞、侨胞、港胞及一切仁人志士，都要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关心、支持县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为子孙后代造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广征博采，忠于历史，服务现

实，开拓向前。

政协的文史资料，浩瀚辽阔，包罗万象。特别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空前剧变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各方人物的浮沉，都是错综复杂的。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的看待这一切，敌、友、我三方面的材料，都在征集之列。要对近世来发生在我县的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合乎实际的记录和评价，不溢美，不贬损，不为亲者讳。“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特别是那些历尽沧桑的老革命干部和各界爱国老人，更要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资料写出来和说出来，以丰富和完善我县近、现代史资料。

当前，我们的文史资料征集时限，上自清末戊戌变法（1898年），下至文化革命前夕（1966年）。凡在这个时期内，发生在我县的政治、经济、军事、工商、科技、民族宗教、文教卫生等方面的人和事，只要具有时代风貌，历史价值，

又属“三亲”范畴，均可博采资料，广征口碑。在革命史方面，我们只征集那些有关统战方面的史料和群众运动。我们强调征集“三亲”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方针，提倡贯彻“文史并茂，史重于文”，“多说并存，文责自负”精神。秉笔直书，存真求实。不拘体裁形式，不求长短完整。让资料说话，凭实事成文。

有天皆丽日，无地不春风。让我们在这春风浩荡，气象万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沿着十三大指出的航向，把我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再提高一步。为我县的经济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广征博采，求实存真，忠于历史，开拓向前！

抗战时期的彭晓林同志

陈 英

彭晓林同志是安徽省庐江县人，因为抗日战争来到了山东的鲁西地区，走过了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段重要历程。谷泉是他在抗战时期使用的化名，鲁西抗日军民熟悉谷泉这个名字。

少年时代，彭晓林同志的家境很贫。全家人给地主作佃农。为了争取有个好一点的命运，一家人省吃俭用，东凑西借，积了一点钱，供晓林一人上学。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他断断续续的读完了乡间的私塾和中学。求学中，他接触到新文化、新思想和广阔的社会，逐渐产生了民主主义思想。毕业后，受北伐战争的影响，他在家乡参加过打击土豪劣绅的民众运动。毕业后，当过乡村小学教师。大灾荒的一九三〇年，重新掀起的大革命浪潮波及到他的家乡，受革命思想的影

响，他勇敢地站出来，领导了家乡人民的米荒斗争。事后，地方国民党政府要捉拿他，他被迫离开家乡，到北京、天津去求学、谋生。在那里，他又苦苦探索了五、六年找到了马列主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军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在北京教书的彭晓林同志，毅然同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共赴国难，奔向抗日前线。他辗转跋涉，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谢觉哉同志介绍。于一九三七年冬天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随后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秋天，他在抗大学习毕业，受党组织的派遣，到鲁西开展抗日工作。

从延安深入敌后到鲁西，沿途多是敌人封锁区，行程十分困难，在敌人眼皮底下钻过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一路上，彭晓林同志总是尽自

己的力量去掩护同志、救助伤员，体现了他对革命同志的深厚情谊。有一次夜间通过敌人封锁区，队伍以很快的速度前进，一位正在闹肚子的同志，因身体虚弱晕倒在路旁，掉了队。队伍已经走出七、八里，才发现这位同志没有跟上来。彭晓林同志决定把他找回来。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只身折回敌人封锁区，找到了那个掉队的同志，背着他赶上了队伍。

彭晓林同志来到鲁西，已是一九四〇年的西月份。从这时到一九四二年八月，他先是在鲁西区党委筹备出版《鲁西日报》，后又任鲁西行政公署教育科长、朝城县政府秘书和阳谷县政府秘书等职。一九四二年九月，调任东阿县县长。我同彭晓林同志认识，是在他任东阿县县长之后。那时只知他叫谷泉，人们都叫他谷县长。

彭晓林同志虽然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但他本人却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和同时代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有过对旧社会的抗争，他本人

最初追求的，也只是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直到抗战爆发，在马列主义薰陶下他才真正找到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革命道路，他的爱国、民主、革命的思想也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所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处处表现出了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牺牲精神。一九四一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环境变的十分恶劣。这时，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畏缩起来不干了，有的甚至投敌叛变。而彭晓林同志却把他在安徽老家的妹妹谷鸣、外甥李皖民和女儿谷岩动员出来，到山东参加抗日。那时他的外甥李皖民还不到二十岁，是个性格刚烈、勇敢坚强的热血青年。来到山东不久，就担任了东阿二区民政助理员，一九四二年被敌人抓去杀害了。彭晓林同志一家人，为抗日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晓林同志在鲁西基本上是做地方抗日政权工作的。他非常重视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善于团结开明地主和进步人士，争取一切爱国民主

力量参加到抗日阵营里来，为抗战做有益的工作。官庄的唐殿安是个大地主，但有民族主义倾向和爱国思想，老彭就非常注意团结他，积极做他的工作，在老彭同志的动员启发下，他卖掉了土地和家产为抗日队伍购买枪支、弹药，积极支持抗战；他还掩护抗日工作人员，为抗日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成为当时有名的开明地主。彭晓林同志坚持在爱国、民主、抗日的前题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既便是敌伪军，只要不是铁杆汉奸，也尽可能地做好争取、瓦解工作。由于工作做得好，有些伪军据点只消包围起来喊喊话就可以攻下来，有的则成为虚设，根本不干涉抗日队伍的活动，甚至还有专门为抗日队伍工作的。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东阿县不少地主乡绅都和贫苦农民一道参加了抗日工作，全县出现了一个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的全民抗战局面。当然，对于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晓林同志也狠狠地镇压了一

批。抗战时彭晓林同志在鲁西两个县当过县长，都能很快打开工作局面，这与他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不开。他领导东阿县的抗日工作时，东阿县的抗战形势发展很快，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扬。

晓林同志打仗不多，但对战事是有一些主意和办法的。因为他毕竟读过几本书，知道一些军事知识。那时抗日队伍的武器很落后，一些好点的轻武器也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根本没有重武器。他在阳谷时，一次队伍打朱庄的据点，据守的汉奸依仗着坚固的土围子负隅顽抗，队伍打了两天也没有打下来。土围子里的汉奸看到我方久攻不下就更加猖狂。同志们都为没有重武器攻不下土围子发愁，还是晓林同志急中生智，想起了做土炮打敌人的办法，就指导战士做了一门木制的土炮，还用酒瓶子填上火药做了一些土造手榴弹。当土炮轰响，呼啸的碎石飞向敌人，掀去了半边城堡时，敌人被吓得屁滚尿流，懵懵然不知

道我方用了什么新武器，一个个乖乖地交械投降了。以后，那一带的敌人都怕我们的“大炮”，就象惊弓之鸟一样，闻“炮”丧胆。

晓林同志作风正派，清正廉洁，为抗日军民树立了共产党干部的良好形象。记得有一次，他带人住在司岗小梁庄，个别人想以招待县长的名义大吃大喝一顿，向老百姓摊派了许多东西。晓林同志察觉后，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叫他们把东西如数退还给老百姓。这件事对当地的干部教育很深。老彭是南方人，对北方的生活本来就不习惯，在抗战环境中，又常常有一顿没一顿的，当地的同志就总想尽量给他弄点好东西吃。一九四三年春节，他是在我的本家叔陈东伦家过的，我的婶子特意为他和他的警卫员准备了饺子。给他送去时，他婉言谢绝，他知道这里的老百姓生活艰苦。他常说：“抗战中最苦的是老百姓，他们要忍饥挨饿地负担战争，我们不能再为他们添麻烦。”他要求所有的抗日干部们，吃、

穿、住都要从简，自己也从不搞特殊。这件事后来在我们村里传为美谈，人们称赞他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好县长。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彭晓林同志在东阿、阳谷等县工作了六年，深受这里抗日军民的敬仰。当时东阿县的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民歌，歌唱谷县长是“敌人的克星，人民的好官。”

注：①本文作者为谷泉同志的爱人现居河南

②谷泉同志简历：谷泉（彭晓林）同志，1906年10月20日生于安徽省庐江县松树村，1938年3月参加革命，5月入党。1939年9月延安抗大马列学院毕业后，来鲁西工作，先后任东阿县县长；冀鲁豫第一行政专员公署秘书主任等；1947年7月随军南下，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厅长等职。1975年12月10日逝世于北京。中央水利电力部长钱正英同志曾题词纪念。其题词为：“彭晓林同志献身事业的精神和诚恳朴素的作风长存我们的心中。”

奔 赴 延 安 抗 大

李 全 恩

黄河之滨，苦山之阳，是我可爱的家乡。这里是齐鲁故国，丝麻之乡，历史上有名的秦缟，鲁缟，就产在这里。“江海所流，无地不润，云雨所加，无物不茂。”（曹植《封东阿王谏表》）。这里有苦羊八景：藏春坞，邀月岩，卧羊峰，溅水塘，磨岸碑，碧虚观，瓠子沟，芦花渡。满山青翠，绿水绕流，男耕女织，怡然自乐。我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家。祖父教育我走“学而优则仕”的路，从小要我上私塾，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文化的传入，乡村逐渐出现了学堂。我于十四岁那年，祖父去世后，才冲出封建藩篱，去外村上小学，童年的许多往事，留给我不少美好的记忆，是黄河的乳汁把我养大。故乡之恋，桑梓之情，时刻牵动我这游子之心，驱使我对往

事加以回忆。

芦沟桥一声炮响，打破了我家乡农村的恬淡自然经济，和平的生活遭到破坏，锦绣河山惨受蹂躏。狼烟滚滚，盗匪遍地。樵歌渔唱哽咽了。琅琅书声也归于沉寂。学校停办，教师逃离，我也从安乐镇小学没毕业就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国民党的队伍一败再败，大道上黄尘滚滚，散兵如蜂。地方土匪四起，各霸一方。兵匪不分，合伙欺压百姓，故乡的父老，在这兵祸匪劫中，叫苦不迭，呻吟挣扎。

地主民团红枪会，散兵游勇洋枪队，都打着抗日的幌子，发国难财，弄的我眼花缭乱，好坏难分。国家怎样才能得救？人民如何摆脱痛苦？时时困扰着我。这时，在济南职业学校上学的本家叔叔李锡瑞，也因“七七”事变，被迫回村。他比我年长，知识丰富，给我讲了些抗日救国的道理。使我逐渐懂得，要想不当亡国奴，只有全民动员，团结抗日。在我十六岁的心灵里种下了对日

寇的恨，对祖国的爱。可怎么抗日，却没有好办法。这时候，我县的党组织已经建立，姜楼高小是我县党的摇篮，不少青年学生，已接受了党的教育，成为党员。他们又积极活动，把革命的火种，引燃全县。一九三八年初，姜楼学生共产党员于广银，秘密活动到我村，通过亲朋关系，我们见面了，他向我介绍了当时的国家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使我逐渐晓得，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国家的希望，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赶走日本鬼，不当亡国奴。

我在党的教育下，看到了阳光，升起了希望，积极参加到革命的洪流中，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结束了苦闷彷徨的生活。这年五、六月份，我和李锡瑞经组织批准，介绍去延安抗日大学学习。当我接到通知的时候，高兴的跳起来。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抗日救国的心脏。毛主席、朱总司令就住在那里，我多么向往它啊！可延安在什么地方，离家乡多远，却十分茫然。家

里担心我年龄小，怕吃不了苦。我耐心地说服了父母，他们给我准备了八块银元作路费，支持我远行。他们知道，日寇侵来，国破家亡，莫说儿子的前途如何，恐怕连性命也难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父母含着热泪送我一程，又一程，鼓励我做个好男儿，立志打东洋，保卫父老和家乡。我也十分激动，我知道父母爱我，但更爱国家。在那战争年代，民族气节驱走了一切私念。我走了，急急的走了。望望吧，再望望吧！为了祖国，为了亲人，儿子要跋山涉水，奔赴延安。

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我们在姜楼高小集合。于广银介绍我们认识了同去的四人，很快，我们就亲如家人。晚上县委书记苏民同志和我们促膝谈心，鼓励我们去延安后，好好学习，不要辜负了党的希望。还要求我们做好克服困难的准备。我是初生犊儿不怕虎，不管延安有多远，不怕山高路险，只要让我去学习，去抗日，天大的困难也不怕。我们这些年轻人，纷纷向县委表决心：

坚决克服困难，胜利到达延安。

繁星点点，夜风习习。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天朦朦亮，我和于广银、李锡瑞、王卓然、任广礼、秦承烈就起床了。我们带着组织上的介绍信，开始了奔赴延安的长途旅行。我们六个年青人，象展翅奋飞的小鸟。高粱笑红了脸，谷子喜弯了腰，风吹树梢过，白杨拍手笑。云是这样的蓝，天是那样的高。这一天，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似乎连乌鸦都变成了凤凰。

第一天我们步行到聊城，虽然累点，但精神愉快，疲痲也就被欢乐赶跑了。次日又是早起，顶着星星上了征程。过临清，走临西，绕清河，到了南宫。南宫，当时是冀、鲁、豫省委领导所在地，管辖鲁西、鲁西北两个特委。徐向前司令员和八路军办事处也在这里。我们到八路军办事处交了介绍信，部队领导接见了我们，鼓励我们战胜困难，早到延安。并告诉我们，好好休息几天，等编好队后，随即出发。这天虽累的够呛，

但一想到延安，就又来了精神。好事多磨，当我正处在亢奋状态时，次日下午有人悄悄告诉我，因我年纪小，怕走不动，领导有意留下我。这无疑当头一棒，泼了一桶凉水，我痛苦极了。我哭着找领导，坚决要求去延安。“我已不小了，什么苦我都能吃，决不掉队！”我向领导保证。心诚所至，金石为开，领导被我的坚定态度感动，表示对我的去留问题再重新研究，要我听从分配。我等啊盼啊，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第四天宣布编队时，听到了去延安的人员中有我的名子，我欣喜若狂，激动的泪花模糊了我的视线。同去的东阿老乡，也高兴的向我握手祝贺。这次同去延安的人有三百五十多个，编成四个中队，我们六个人编到三中队七班。出发前，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同志给我们讲话：“同志们马上就要踏上去延安的征程，前进的路上有山、有水、有敌人，大家要团结互助，听从指挥、胜利到达延安。祝你们一路顺风！”广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队伍象一股铁流，摧枯拉朽，向延安流去。

天高气爽，万里无云，再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我又想起了故乡的山、水和大枣、月饼。门前枣树上的大红枣熟了吧？咬一口又脆又甜，往年这时候和小朋友正在枣树上摘枣捉迷藏呢！去年的中秋节，我和全家人围桌赏月吃月饼。可今天却离家远征了，谁知这一去，何年何月才能再回来。但一想到这是去延安学习，惆怅伤感情绪就远遁了。

经过几天连续急行军，我的脚上打了泡，虽然有些疼痛，但心里愉快。有一天，我们已走了六十余里，眼看太阳快落山了，前面传下话来：

“注意！快到封锁线了”。这是我们去延安的路上，经过的第一道封锁线——平汉铁路。我的心情异常紧张，封锁线是啥样的？敌人是否有重兵把守？心里充满了疑问。快到封锁线时，队伍停下来，带队首长给我们讲话：“大家不要怕，有部队掩护。要听从指挥，不要掉队，不要有火

光，一定要冲过铁路。”这时，天已完全黑了，我们趴在路旁庄稼地里，紧张地望着前面的一片黑暗。忽然，听到了隆隆声。日本巡逻车耀眼的亮光，刺破了神密的夜空。看到这个日本怪物张牙舞爪的横行在祖国土地上，真想一脚把它踢翻。等巡逻车过去，一切复归沉寂。我们跑步冲过铁路，口令不断传下来：“快！快跟上！”我深一脚浅一脚的一溜小跑。我们连走带跑，日夜兼程，进军一百二十里。当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朝霞染红半边天的时候，太行山笑着接待了我们。十七岁的我，从未离开过娘怀。这次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第一次走这么多路，真有些抗不了。浑身疼痛，脚有千斤重，一坐下就不想起来。同去的战友，处处伸出温暖的手，特别于广银大哥，更对我关怀备至，架着我，扶着我，鼓励着我。他领我上路，助我前行，使我永生难忘。

进入山区，俨然到了另一个天地。这是八路军活动的地方，呈现一派和平景象。山坡上牧羊人

赶着羊群，我的同龄人，高唱着二小放牛民歌。满山的柿子树上，枝头累累，挂满了火红的“小灯笼”。山谷平原上，秋庄稼已经收获，农民正在刨土豆。进入深山，人烟稀少。偶尔在绿树丛中露出瓦房一角，那是寺庙的踪迹。我们辟开荒草荆棘，攀越悬崖陡壁，上山下山，过谷爬坡，走的腰酸腿疼，脚上打起了血泡，一到宿营地就忙着打水洗脚。队伍的行军速度，也逐渐慢下来，有时一天仅走三十里，最多六十里。虽然艰苦，但精神愉快。文艺宣传队，每逢我们爬山时，就鼓励我们加油！一宿过去，又生龙活虎，歌声嘹亮的开始出征。

宿风餐露，披星戴月，我们越过了上下七十余里的大绵山，到了第二道封锁线。跨过同蒲路，还要涉过汾河。铁路线有敌军把守，汾河水流湍急，又没渡船，需徒步涉过。我心里有些发慌，我个子太小，河水不会把我淹没吧？于广银和李锡瑞及时安慰我：“小李不要怕，我们两个

架着你过河。确保安全！”我心里激动万分，这就是同志间的爱啊！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领导向我们介绍了封锁线的情况与穿越事项，并告诉我们，大部队已来掩护我们，要沉着勇敢。

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西北风飒飒吹着，冷气袭人。我们焦急的等着命令，仿佛听到每个学员的心，在急剧的跳动。命令传来：“前进！不要滑倒！不要掉队！”队伍在夜海中快速进军。深深浅浅的走了十多里山路，钻过隧道，安全越过同蒲路，紧接着就冲下了汾河。大家手拉手，防止被水冲倒。河水凉澈骨头，水流湍急，难以立稳。两位战友左右架着我，河水渐渐淹没了我的胸部。我有点紧张。幸亏他们架着我，我用脚尖着地，才没有灌进口中。过了河，队伍拼命的跑，沙滩上洒下了无数河水和汗水。紧接着就爬上了土山，进入了荒漠的安全山区。到了山顶时，曙光已悄悄来临，战友互看，人人都象个泥人。在黎明前的寒风里，汗气和水气笼罩着每个人。

我们的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胜利地冲过二道防线，离延安更近了。后来，领导沉痛的告诉我们，过汾河时，有六位战友被水冲走，为革命牺牲。我们都非常悲痛。当场发誓，这笔血债要向日寇讨还！勇敢向前，完成烈士的未竟之业。

第三道封锁线是黄河。到河边时，只见浊浪拍岸，浪高流急，一个个浑浊的漩涡，象猛兽的血盆大口，对岸还有国民党的兵在把守。天险和重兵，构成了极难冲破的封锁线。这时已是农历十月初十，北方的冬天已开始，顺河风吹在身上，象披上了一层冷水。

我们好不容易找来两条小船，每船只能坐二十人，当第一船刚到河心，被国民党守军的猛烈射击顶了回来。于是，领导又组织二次强渡，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对岸，与国民党进行严肃的谈判交涉。说明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过河是去抗日，不让渡河，就是破坏抗日。这时国共合作刚达成协议，谁也不敢承担破坏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罪责，只好勉强停击让渡。风大浪高，船到河中心，忽被掀到浪尖，忽被抛回谷底，我的心缩成一团，战友们也紧张的瞪着眼。船夫安慰着我们，要我们不要怕，即便敌人开枪，也不能乱动。我们都静静地稳坐在那里，经过一番搏斗，顺利地上了岸。过河后，我们就进入了陕甘宁边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遍了田野村庄，人们忙着生产支前。到处是一片生机盎然，轰轰烈烈。我们经过米脂、绥德，又走了七天，终于到达了朝思暮想的延安。望着那高高的宝塔山，捧起那清甜的延河水，心中充满了无比喜悦。我们马上就要见到党中央首长了！我们即刻要看到毛主席了！我们欢腾，我们跳跃。

延安，是抗日圣地，是民族希望。一时汇聚那么多革命健儿，窑洞十分紧张。我们住在一个大庙里，等待编队分班，开始学习。这时，日寇又要轰炸延安，党中央进行暂时疏散，我们还没

来得及分班，又被安排去庆阳府，临时编为八大队，队长何长工。又经过半个月的急行军，到达甘肃庆阳。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建抗大晋东南分校。于是我们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修建校舍，清除瓦砾，很快因陋就简，开始上课。岂知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指导下，处处破坏合作抗日，制造摩擦。为了学员的安全，校党委经上级批准，仍叫我们回延安。我们背上挎包，迈动双腿，日夜兼程，历时半月，又回到了延安。我们原来的大庙，已被日寇炸毁，于是被党中央安排在青凉山上的窑洞里，先进行预备期学习，预习期毕业后，被正式编入抗大柳树店第二大队学习。

我们六位同乡战友，经过四、五个月的行军，爬过了高山低地，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到达延安抗大，开始了新的生活。从此，把我的一切，完全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

注：本文作者现为国家机械电子工业厅副厅长。

刘邓大军军械工作回忆片断

(1946——1947)

任 英 杨志高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下山摘桃子，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晋冀鲁豫军区处于解放区南线的中央，除要粉碎敌人对本地区的进攻外，还担负着前与中原、左与华东、右与陕甘宁我军进行战略配合和策应的重要任务。据此，军区于六月二十七日以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率领，担负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接着于七月十四日组成野战军指挥部，由邯郸开赴冀鲁豫前线指挥作战。为保障十余万大军作战，给当时的军械工作提出了繁重的任务。

一、军械工作的特点

刘邓大军开赴冀鲁豫前线后，武器弹药的前运后送，开始由冀鲁豫军区军械科担任，科长是孙毓桂，参谋三人。枪支弹药仓库在菏泽县，运输工具靠民工和马车，有一个排的警卫部队。第一次陇海战役后，军械工作任务异常繁重，当时的组织形式很不适应作战的需要，根本不能保证大兵团作战任务，为加强军械工作，组建了晋冀鲁豫前线军械科，任命郭嗣炳为军械科长，任英为政委，军械科下设三个股，保管股股长任建华，保管员十名，杨志高担任统计工作。运输股长薛增胜，运输员九名；总务股股长、会计、管理员十余名，并设有警卫连、马车队，总计三百余人。还经常调用民工、牛马车前运后送。前运的有太行山根据地和东北经烟台送来的武器弹药。后送的有美式榴弹炮及炮弹、迫击炮、掷弹筒、步枪、马枪、卡宾枪等大批缴获的武器。

当时军械工作的主要特点：一是部队大兵团

(十余万人)作战。打的是运动战，而且是连续作战。如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月，连续出击陇海、定陶、巨野和鄆南，打了四个战役，军械工作前送后运武器弹药的数量大，仅手榴弹就消耗九十七万五千三百一十五枚。二是前线的军械仓库完全处于运动当中，在农村储存，运输工具落后。一次战役要准备几十万手榴弹、子弹和炮弹，要用几百辆牛马车拉，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制造厂制造。在这里应感谢在根据地的工人同志们，在那艰苦的年代里，能造出那么多的弹药，而且是部队打到哪里就供应到哪里，任务是多么艰巨啊！鲁西南诸战役之后，全科召开了庆功大会，有五分之一干部战士立功受奖，科长、政委也立了功。

二、紧急搬运弹药

一九四六年八月，刘邓大军陇海战役十三天，歼灭敌人正规军两个旅，五个保安团，共计一万六千余人，解放了碭山虞城、兰封、杞县、

通许。占领火车站十三处；破坏铁路二百里。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忙从豫西、陕南抽调三个整编师，从淮北抽调两个整编师投入冀鲁豫战场，连同原在郑州、新乡、开封、商丘等地的七个整编师，共有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二个旅，计三十余万人，向冀鲁豫军区腹地发动进攻。我野战军各部主力，根据上级命令，大踏步的后撤，只留下少数部队监视敌人的行动。在冀鲁豫军区所在地菏泽，党政军机关已按计划全部撤出，将一座空城留给敌人。但野战仓库在菏泽以北地区，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存放在几十个村庄内。当时菏泽地区连降暴雨，到处是水，路途泥泞，军械科全力以赴，仓库也不可能按计划转移出去。时间紧迫，十万火急，军械科领导亲自将这一严重情况报告了野司。刘邓首长知道后，马上命令段君毅同志限期搬走，确保万无一失。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同志，采取果断措施，即刻将任务交给了菏泽县委并下了死命令，限三日之内搬走，若丢了武

器弹药以军法论处。县委领导干部即刻在现场召开紧急会议，各区按村分库，男女老少齐动员，点清数目包干搬运。我区军械科的全体同志进行总动员，人员车马全力以赴的投入战斗，我们既要发又要扛，还要收，紧紧张张搞了三天三夜。当地党政干部和广大群众，搬的搬、扛的扛、拉的、驮的、推的热火朝天。那些可爱的儿童团员也每人担了十个手榴弹，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大量武器弹药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还有七千手榴弹因敌情紧迫和天气突变来不及搬走，群众即刻就地掩埋，后来部队来取时一颗不少。人民的支持使部队广大指战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为杀敌立功，解放全中国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三、鄆南战役缴获了汽车大炮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刘邓首长在定陶以西的定陵集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总结作战经验。为了分散麻痹敌人，争取时间，以利再战，

决心放弃菏泽，让敌人分兵把守。敌人进驻菏泽后，于九月二十二日，五军、十一师沿荷（泽）巨（野）公路齐头并进。十月三日。五军到达巨野以西的龙堽集地区。十一师突出于巨野以南的张风集地区。此时，我军二纵首先阻击敌五军于龙堽集以西，然后集中三、六、七纵队，一举歼灭敌十一师十一旅于张风集。战役从十月三日夜开始，战斗到七日上午，敌十一师三十二团及特种兵三千余人全部歼灭。二纵队的运输防御战打的也很出色，取得了很大胜利。敌五军仗恃他的美国先进武器，激战十一天，前进仅五公里，伤亡却二千余人，始终没有越过龙堽集一步。

当敌人再次向我组织进攻时，我主力已西进濮阳地区待机歼敌，十月二十八日，当我进至鄄城东北地区时，发现敌人刘汝明部一一九旅和二十九旅一个团，由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指挥，从菏泽向鄄城前进。刘司令员当机立断，立即命令部队停止西进，决心捕歼该敌。十月二十九日，

敌人进到鄆城以南高魁庄、任庄、刘家庄地区，我军迅速以优势兵力当夜将敌人包围，然后分割歼灭，到三十一日十一时，全歼该敌九千余人，生俘旅长刘广信，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汽车，同时缴获了敌炮十团一营两个连的美制一〇五榴弹炮八门及观通器材，在此基础上，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山东莘县梁培营村正式组建晋冀鲁豫军区榴炮团。当时我野战军械仓库是在山东莘县梨园地区，解放区人民亲眼看到我缴获的美式汽车大炮，莫不欢欣鼓舞。我部队干部战士由步兵改成炮兵，更是眉开眼笑。淮海战役后，因装备不断发展扩大，榴弹炮团很快又改为二野炮兵第四团，团长张量，政委史洛，参谋长韩俊，政治处主任孙铭。从此刘邓大军有了摩托化炮兵部队，军械工作又增加了新的课题。

四、抢渡黄河天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撕毁国共两党签定的协议，妄图“以水

代兵”分割淹没解放区，悍然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堵住了花园口口门，滔滔黄河回归了故道。

我们军械科这时正在全力前运后送大批武器，有的运输队正在快马加鞭向各纵队补充弹药，忽然接到上级的紧急命令，国民党政府在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已合笼，军械科的一切武器弹药和运输工具要星夜抢渡黄河以北，否则就要被阻于黄河以南，被敌人抢去。这时我们的运输队是在黄河以南，而且正在向前方运输。半路上遇着一位首长，问明我们情况后命令我们向回返，由于我们是按野司的计划往前运的，怕耽误战机负不了这个责任，当即表明了这个态度，他说：我是十一纵队司令员王秉璋，错了由我负责。我们立即执行命令，带着运输队往黄河边行动。在过河时，第一梯队顺利过去了，最后的梯队却遇到了麻烦，已有水漫过河滩。我们立即组织人力连推带拉的勉强渡过了黄河，由于我军械科运输

股所带的运输队跑的太远，回返困难，当回到黄河边时已是黄水滔滔了，没有船根本过不了黄河。近百辆大车民工和押运部队，聚集在黄河南岸。敌机轮番轰炸，加上炮兵射击，情况非常紧急。由于我主力部队的阻击掩护，敌步兵短时间内未能到达黄河边，才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敌情严重，刻不容缓，我们立即请求黄河司令部派船支援。船运四大队驻寿张县孙口一带，有六百五十六人，三十多条船，但上级有命令，白天禁止放船。我们万分焦急的等到晚上，黄河司令部才给我们调来两只大船，我们河南岸的运输股长是船渡的总指挥，经过研究后，船渡方案是先运人和牲畜，后运物质和车辆，就是先运活的后运死的。并宣布，若丢了民工的物质，由军械科出证据，政府赔偿。开始还算顺利，经过紧张的船渡一夜之后，还有部分人员牲畜没有运完。上级指示，这是天明前最后一船，余者明晚再运。为了照顾跟随已久的民工民兵，总指挥运输

股长薛增胜同志执意留下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我们几个参谋坚持这船让他任船长过黄河北，由我们与群众在一起等候明晚过河，这时谁也搞不清楚敌人步兵何时到黄河边。这样争执数次，总指挥仍不上船，我们几个参谋咬了耳朵作了一下分工，由运输股的参谋留下，保管股的参谋随总指挥上船，我们把薛股长推上船，即刻拨动船头，没想到这个负伤多次的薛股长一跃又跳下船去，警卫员也随之跳下，船只好按照总指挥的意见行动了，这个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指挥员，给我们部下和人民群众留下了一个英雄的形象。由于黄河南岸党政军民组织的好，敌人第二天未能到达黄河南岸。第二天晚上，我们继续执行船渡任务，千方百计的把最后一部分指挥员、战斗员、民工、民兵、牲畜等运过黄河。

五、战略进军前的弹药补给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豫北战役结束之后，争取时间进行修整，准备战略进军，这时可忙坏

了我们军械科的全体同志，当时有两项任务，一是要补充十万大军的弹药，二是要准备随大军南下。

刘邓大军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准备战略进军时，布署在黄河北从山东东阿县至濮阳城三百里长的黄河一线，野司要求每个战士要补足手榴弹四枚，子弹近百发，轻重机枪、大小炮、迫击炮、弹药都按基数补足，我们的弹药库设在阳谷地区，我们本部有马车队，还配属了汽车队，牛车队，往返驰骋在三百里的黄河岸边。部队整训一个月，我们忙了一个月，工作大部分在晚上进行。据杨国宇同志回忆：“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下午，我发完了六百辆大车的炮弹，算一下总重量四十八万斤。这样阔的家当，还是我入伍以来的初见。”

我们完成补给任务之后，又进行了紧张的移交工作。接收工作是由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负责军械工作的领导魏垒同志派人接收的。交待后，

我们保管股在阳谷县张海村向当地政府和人民告别。群众欢送子弟兵的那种热烈场面，现在想起来还热呼呼的。告别后，我们在寿张县马庙村集中南下，过黄河时是在寿张城南。黄河北岸的孙口（现属河南省范县），是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中心渡口，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当时就从这里渡过黄河，从那时起，这个渡口就被人们称为“将军渡”。一九八〇年后，政府在此处树立了一座高三米、宽一米、厚零点三米的石碑。上面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孙口渡河处”的大字，目的是为了纪念这一重大事件。

我们南下时，编入了南下支队序列，南下支队司令部参谋长是谭善和同志，南下支队带了上万名地方干部，带了几十万银元。军械科南下的同志，又成了银元运输队。直属三个荣军团，与主力部队十纵同路南下。时间是一九四七年九月。打过陇海路，路过黄泛区，渡过沙河，徒步

涉过淮河，经过二十余天，冲破敌人的天上地下阻拦，插入大别山区。渡河南下，运输支前，东阿县人民做出了极大贡献。

后 记

晋冀鲁豫军区前线军械科，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战火纷飞的鲁西南平原组建起来的，担负鲁西南许多重大战役、战斗的弹药补给和运输任务，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进中原的情景记载了如下诗篇：

一

军令下达离寿张，
男女老少叙情长。
投鞭断水扫魔怪，
远走高飞志气扬。

二

踩波踏浪去歼敌，
万马奔腾战略奇。
餐风饮露踏险径，
山高水深过河堤。

三

朦胧夜色群山隐，

敌寇堵截军情急。

千战齐心破匪寇，

淮河强渡红旗举。

四

硝烟滚滚雨生威，

跃上悬崖擒惯匪。

忽见月光云劈散，

气吞山岳走如飞。

五

东风劲吹震四海，

红旗漫卷闪异彩。

直上云霄何所惧，

翻山越岭炼人才。

六

千里跃进大别山，

狭路相逢见英勇。

破釜沉舟打天下，

浴血奋战勇者胜。

七

八

刘邓大军进中原，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一把利剑插敌间。 难忘征途一把雪。
 调动蒋军千百万， 大别山上奋战日，
 回转淮海大会战。 名垂千古永不灭。

注：（一）投鞭断水，指人马众多，兵力强大。

（二）气吞山岳，指气势可以吞没山岳，形容气魄很大。

（三）破釜沉舟，比喻下决心不顾一切地干到底。

（四）淮 海，指淮海战役，在解放战争中，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现名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淮海一战歼敌精锐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共五十五万五千人。

解 放 鱼 山

史 光

鱼山位于原东阿县城（黄河东老县城）以西黄河西岸，是东阿县城通向黄河西我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距东阿县城八华里，战略地位很重要，日寇在这里安了伪军据点（是东阿县黄河以西二十多个日伪据点中解放最晚的一个）。

一九四四年夏季，我们为了彻底肃清东阿县黄河以西的日伪军，扩大与巩固河西抗日根据地和加强城区的工作，准备解放东阿县城，决定先解放鱼山。

（一）准备工作

当时住在鱼山伪军据点的，是东阿县伪警备大队的第六中队，这个伪六中队是我们敌伪工作基础较好的一个中队。当时我在东阿县委敌工部工作，兼县武工队政委。该伪中队的工作是我直接做的。早在一九四三年春季，该伪中队驻东阿四区凌山伪军据点时，我就和他们建立了敌伪工作关系，当时和我直接发生关系的，有伪中队长任玉清，伪司务长陈××，伪小队长安福庭、周脉宪，伪班长庞同润，伪中队长的传令兵任玉华等。一九四三年秋解放凌山时，就是我事先和他们做好了工作，使他们一枪未还就跑到陈店子日伪军据点去了。解放鱼山时，该伪军中队长是赵培善（我也和他建立了关系），司务长是周脉宪，其他无大变化。

当时我们负责解放鱼山的部队，是冀鲁豫军区第一分区独立三团，团长是梁仁魁。解放鱼山

的前一天，我独立三团驻鱼山西边林马庄一带。当时我因事驻在东阿四区耿集，当天下午梁仁魁派人去耿集找我，对我说：“今天准备解放鱼山，军分区独立三团已进驻林马庄一带，梁团长请你快去。”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骑自行车与送信人一同到独立三团去了。见了梁团长，给我说了关于解放鱼山的意见，并让我做鱼山炮楼上伪六中队的工作。当时太阳已经落了，我对梁团长说：“天晚了，炮楼关门了，无法和他们联系，明天再做吧！”梁团长说：“也只有这样。”

次日上午八时，我派人把伪六中队中队长赵培善、司务长周脉宪、小队长安福庭三人叫下山来，和他们商谈解放鱼山的问题。我说：“今天把你们几位请下山来，和你们商量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决定，今天晚上要解放鱼山，让你们这个中队全部起义，改编为抗日的八路军。这两年来，你们为抗日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到了你们为国家、为人民

立功的时候了。希望你们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坚决起义，这是你们的光荣任务，也是你们的光明前途。”他们三人听过后，都先后发了言，他们共同的意见是：没有估计到抗日战争形势发展这样快，缺乏思想准备，觉得有些突然。他们说：“为了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决定解放鱼山，让我们这个中队全部起义，改编为八路军，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我们有一个实际困难和要求，请领导照顾。这就是我们的家属都在东阿城里，还被敌人统治着，我们如果当了八路军，敌人要杀我们的家属。因此，我们要求上级能照顾我们这个实际困难，我们起义后能让我们五个人（即伪中队长赵培善、司务长周脉宪、小队长安福庭、班长庞同润、和伪中队长的一个传令兵×××）各带一支枪跑回东阿城里去，如果不带枪跑回去，是要杀头的。我们跑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做地下抗日工作。”这时，我给解放鱼山前线司令部写了一封

信，商量如何回答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司令部回信说：“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同意答复他们的要求。”他们非常感谢上级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然后就商量解放鱼山的具体方法。我说：

“我先提出几点初步意见，咱们再共同商量：第一，解放鱼山的具体时间从今夜十二时开始，到时我八路军在炮楼北边向东阿县城方向打枪，造成攻打炮楼的声势；第二，你们听到枪声后也向东阿县城方向打枪，你们打一阵枪后，就把炮楼门打开，让八路军进炮楼；第三，八路军进炮楼后，你们就自动把你们的队伍整理好，有秩序地带下山来；第四，从开始打枪到队伍下山来，时间不能超过四十分钟，如果时间长了，城里的鬼子来了就麻烦了；第五，你们把队伍带下山来以后，对你们准备跑回东阿城里去的五个人，每人发给一支枪，让你们离开队伍，在一边休息，你们就利用这个机会逃跑，我们也不追你们。”他们三人都同意我的意见，我又到解放鱼山前线指

挥部作了汇报，就这样做了决定。

(二) 活捉伪中队副孙×× (名字记不清了)

当天下午十点多钟，伪六中队司务长周脉宪、小队长安福庭下山来对我说：“伪六中队副队长孙××，听说鱼山附近驻了八路军，思想很惊慌，他给东阿城里打电话，电话不通（电话线被我军割断了），他要去东阿城里向伪县长董继昌汇报情况。孙是伪县长董继昌的内侄如果孙××向伪县长汇报了鱼山的情况，伪县长可能派队伍来支援鱼山。那样，鱼山的情况就复杂了。”我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如果伪县长派伪军来支援鱼山炮楼，将会影响我们解放鱼山的计划。我对他俩说：要千方百计不让孙去东阿城里。具体办法：第一，你们对他说：听说鱼山附近驻了八路军，如果进城可能有危险，劝他不要进城；第二，如果他坚决要去，你们就对他说，为了缩小目标，不要带队伍，可化装成老

百姓去。我们派人去进城的路上截他；第三，如果他一定要带队伍去，你们就派最可靠的一个班和他一同去，你们给班长交待好，如果在路上发现前面有人打枪，就跑回来。我们派人在进城的路上等着他们，发现他们后就向他们打枪，这样他们就进不了城。”周脉宪、安福庭听后都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说：你们快回去按这个精神给孙作工作吧！我在这里等着你们，你们快把给孙谈的结果告诉我，我好作安排。过了约半个小时。上午十一点半钟，周、安下山来对我说：

“孙××一定要回东阿城里去，经过我们作工作，他决定不带队伍，自己化装成老百姓走，和他一同走的还有一个会计，进城去报账，决定中午十二点钟路上人少的时候出发。”我又问了孙××的身材怎样，年龄多大，有什么特点，了解到孙是个黑大个子，满脸黑胡子，约四十岁左右。

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我和东阿县武工队队

长张醒民同志，副队长陈诚同志，还有两个队员共五人，骑自行车顺着鱼山去东阿城里的公路向东阿县城方向出发了，到离鱼山二里路的一个小茶棚里停下来，等待那位孙队副。中午十二点十分，公路上从鱼山方向来了两个人，他们二人一前一后，中间相距七、八十米，前者离我们约一、二十米时，我们就迎上去了，一看正是孙××的样子，我们也没有问他什么，就叫他跟我们走了。那个会计我们也没有管他，他又返回鱼山。我们把孙带到鱼山北边三里路的一个小村里，在那里休息吃午饭。孙非常害怕，我们叫他吃午饭，他不吃。我们给他讲了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做了下思想工作，他思想上不那么害怕了，才吃了一点饭。

(三) 伪八中队来鱼山增援

驻东阿城里的敌人，听说鱼山一带驻了八路军，他们恐怕打鱼山炮楼，当天下午，敌人便派东阿县伪警备大队第八中队到鱼山炮楼增援。伪

八中队，我们的敌伪工作基础也比较好，伪中队长赵鸣九，是我们在敌人内部发展的共产党员。他接到叫他去鱼山炮楼增援的命令很高兴，认为率部队起义，参加八路军的机会到了。出发前做好了去鱼山起义的充分准备，他除把伪八中队的全体人员都开去外，还把该队多余的五、六十支步枪，装到马车上，用被子盖着，叫他老婆坐在马车上，全部拉到鱼山炮楼去了。当天黄昏前，伪八中队到达鱼山炮楼。这样，鱼山炮楼的伪军就由原来的一个中队，增加为两个中队了。

（四）战斗打响以后

当天晚上，解放鱼山前线司令部，重新分析研究了鱼山炮楼的情况，认为敌人派伪八中队来鱼山炮楼增援，使鱼山炮楼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伪军由一个中队增加为两个中队，今晚解放鱼山虽和伪六中队布置好了，但伪八中队由于来的晚，没有和他们取上联系，无法给他们布置，解放鱼山的行动计划他们不知道，这是个困难条

件。好在伪八中队中队长赵鸣九是共产党员，估计问题不大，到时他会响应我们的号召的。今晚解放鱼山的计划也不好再变了，仍按原计划执行。

当天夜里十二点，解放鱼山的战斗打响了。我八路军在鱼山炮楼北边向东阿县城方向打了一阵枪。同时炮楼上的伪军也向东阿县城方向打了一阵枪。按计划这时伪六中队应主动地开炮楼门了。但是他们迟迟不开炮楼门，原因是炮楼上又增加了一个伪八中队，他们怕主动开了炮楼门，如果伪八中队传出消息去，东阿城里的敌人会杀他们的头，特别是伪六中队中队长等五人，还准备回到城里去。我看了看表，战斗已经打响二十分钟了，他们还不开炮楼门，我就到炮楼北边去给他们喊话：“伪六中队和八中队爱国的官兵弟兄们！现在是你们为国家为民族立功的时候了，希望你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也为你们个人的前途着想，马上把炮楼门开开，全部起义，光荣地参加八路军。现在战斗已经打响二十分钟了，拖

的时间长了，万一城里的鬼子来了，就不好办了，希望你们马上开炮楼门。”在这个关键时刻，伪八中队长共产党员赵鸣九挺身而出，亲手把炮楼门开开了，这时我八路军便迅速进入了炮楼，接着两个中队，分别把自己的队伍整顿好，有秩序地带下山来。解放鱼山的战斗胜利结束了。

（五）放赵培善等六人逃跑

伪六、八两个中队下山以后，按原计划对伪六中队中队长赵培善、司务长周脉宪、小队长安福庭、班长庞同润、伪中队长的传令兵×××等五人。每人发给他一支枪，然后我就把他们五人安排在一边休息，同时，把上午捉到的伪六中队副队长孙××（伪县长的亲戚）也和他们五人安排在一起，目的是，让他和那五个人一同逃跑。我对他们六人说：“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看看队伍整理好了没有，整理好队伍我就来叫你们，一同出发。你们要讲信用，不能逃跑；如果逃跑，捉回来枪毙。”他们说：“我们不会逃跑，请你

们放心吧！”我离开他们以后，赵培善等五人便要逃跑，而孙××不同意，他说：“八路军待我们这样好，我们应该守信用。不能跑。”赵培善等五人说：“你不跑我们跑。”于是孙××也跟赵培善等五人一同跑了。过了约五分钟，我故意大喊了几声，我说：“这些家伙逃跑了，真不守信用，追，打！”这时我叫通信员朝他们逃跑的方向打了几枪。

（六）抗日独立支队的成立

伪六、八两个中队起义以后，就地改编为抗日独立支队，归军分区独立三团领导，任命中共东阿县委敌工部长韩雁北同志任副支队长。原伪八中队改编为第一连，由原中队长赵鸣九同志任连长，原伪六中队改编为第二连，因原中队长离队，临时指定一位同志代理连长，抗日独立支队就正式成立了。

解放鱼山的战斗胜利结束，东阿县黄河以西地区全部解放了。

注：史光同志又名史乐清，东阿大太平人，1919年生，1939年参加工作并入党，先后在东阿任区委书记、区长、县委秘书等职，47年随军南下，后调任河南省卫生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1983年底离休。

抗日时期的东阿公安局

李建民

我是40年秋由鲁西区党委社会部到东阿县组建公安局的，后任局长，45年下半年到博平县任县长。

东阿县公安局初建时人员很少，总共有十多个人，我任局长，张醒民同志任服务队长，负责侦察工作，曹子魁同志负责审讯工作，陈金贵同志任保卫队队长。保卫队是一个连的架子，有七、八十个人，是直接对敌特斗争的一支有力武装，内设看守班负责管押犯人。

我到东阿县公安局时，抗日战争形势十分残

酷，环境恶化到了极点。日寇大搞所谓强化治安，实行蚕食和碉堡政策，他们修公路、建炮楼，挖封锁沟。全县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妄图把抗日力量围困致死。国民党东阿县保安司令刘德超投敌当了汉奸，在苦山、广粮门建据点，任汉奸大队长，下属十五个中队共二千多人。我们内部有的叛变，有的投敌；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当时处于被动局面。当时县委指示，第一要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健全党的组织，掌握乡村政权；第二要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提出抗日一家的口号，争取教育士绅名流、地方武装参加抗日。那时公安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鬼子，除汉奸，除暴安良。在斗争方法上，主要是进行秘密调查，破坏敌人特务组织，尤其重视开展敌伪工作。在斗争策略上，注意公开、秘密相结合，宽、严相结合，在敌人据点里面设情报网，敌人举动一般都摸的清，重点打击少数死心塌地的敌特分子，汉奸中的坏中坏。教育争取多数，使他们同情抗日，支持抗

日。

记的大约在42年环境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在碉堡底下打死了一个特务大队长叫孟广福。孟是个很顽固很反动的家伙，他给每个碉堡的伪军开会说：“谁私通八路就枪毙谁”。我们知道后，经上级同意，决定打击坏中坏，除掉孟广福。于是派张醒民带领陈金贵、袁子荣、杨吉贤等同志，在敌人战略性的铜城据点附近、孟的小老婆处，将孟击毙，为民除了害。

还有一个影响较大的事件，当时有个叫周庆印（外号周寿）的，原来是我们鲁西日报社的编辑，后来因环境恶化，他叛变了。因为他知道我们地下党组织许多秘密，所以组织决定除掉他。我当时和韩雁北（当时任敌工部长）同志研究，通过内线李雷峰（李振元）把周庆印引出门，在王小楼据点东的枣行间把周抓获。为了让李雷峰同志继续留在敌人内部，我们又假装打枪追了一阵子，把李送回据点。

活捉周庆印，是敌工部长韩雁北同志带着公安局保卫队的杨继贤等同志干的，周庆印捉到后当晚就枪决了。

在东阿苦山据点里，我们除掉了一个汉奸中队长张仙州。当时其他据点的汉奸都怕我们，不少据点有我们经斗争争取过来的人，给我们送情报，掩护我们的干部。唯有张仙州与我们坚决对立。经教育争取无效，我们决定除掉他。张仙州是国民党员，伪第十五中队长，准备提任为副大队长，这家伙阴险狡猾，铁心为日寇效劳。我们也是通过内线李雷峰同志约张仙州到一个汉奸的家中去喝酒，公安局的杨继贤偷偷进去，趁张不注意时把他打死。当时是在苦山炮楼底下干的，在敌人慌乱之机李雷峰、杨继贤等同志撤出敌人据点。

在芦集村有个土匪窝，赵吉良、赵吉仓兄弟，外号“土匪店”。两赵敲诈抢劫，强奸妇女，破坏抗日，当地群众恨之入骨，而两赵有枪有

人，做事凶险毒辣，群众都惧怕他，要求政府为民除害，当时我们认为两赵的“土匪店”只能智取，不能明拿。因为面对面的开火，会伤害当地群众，打草惊蛇，留下后患。当时决定派服务队长张醒民带着少数服务队员，偷偷潜入芦集村两赵的大门附近，趁两赵回村进门时，张醒民同志一个箭步窜上去，用枪顶住了两赵的头，二人老老实实地束手就擒，后被处决，对敌人震动很大。

对反共和反对抗日的反动组织，我们公安局组织力量予以坚决打击。南贺庄组织了忠孝团，宗旨是反对共产党，投靠日本，充当汉奸。忠孝团的头子是贺立训，他扬言坚决和共产党作对，准备到八月十五插龙旗造反，杀八路战士的头祭天。我得到情报后，认为性质是严重的，如不马上予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但去的人数多了，会打草惊蛇。擒贼先擒王。我亲自出马，带着邢玉玺和伪乡长周脉占，出其不备地到了贺立训的家中。我对贺说，你不是要杀八路的头祭天吗？今

晚上给你送上门来了，我这个公安局长的头可以吗？我掏出手枪放在桌上，吓的贺立训跪在地上一个劲地求饶，声言马上解散忠孝团，以后坚决不干坏事，并主动参加抗日。当时没有杀他，以后这个人真的不干坏事了，各方面表现也很好。

除掉一些认贼作父，死心塌地，甘心情愿当亡国奴的汉奸，对敌伪人员震动很大，我们积极加强宣传，指出“不管哪个特务组织，只要破坏抗日，反对八路军，就叫他们走孟广福的路”，极大的震慑了敌人，许多汉奸和特务同我们拉关系，如当时东阿最大的日本特务机关平井大队队长王得章，就主动找张醒民同志联系，表示以后同情抗日，不干坏事。除掉了几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特务头子后，是我们公安保卫工作的一个大转折，也是全县形势的转折点，敌伪特务的活动有所收敛，我们的工作则步步得利。

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公安工作也非常重视搞统一战线工作，做到团结多数，打击少

数，教育、分化、瓦解敌伪人员。如周脉占，刘义路、唐殿安等大地主，就被我们争取过来一致抗日。当时铜城有个开明绅士周林庆，敌人在铜城安据点后，环境恶化就当了汉奸区长。我知道后及时在铜城西关找他谈了话，对他进行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准他干坏事，以后他一直没干祸害老百姓的事。

我们经常派人深入敌人内部工作。当时“新民学会”有个雷保香就是我们派进去的。他是铜城中街人，我们经常派地下党员雷保堂、雷金玉、雷玉良通过申脉旺与他联系搞情报。申脉旺在小沈庄开了个小酒馆，这个小酒馆一直就是我们的情报站，这些人对抗日是有贡献的。

回忆在东阿工作的几年，那时公安保卫工作的成绩是很突出的。在四二年间，东阿一带尽管形势恶化，但抗日力量基本没受很大挫折。首要原因是发动广大群众，积极抗日，不当亡国奴；其次是搞统战工作，动员各方力量参加抗日，高

喊抗日一家的口号；第三是广大群众的支持与掩护，使我们的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打败日本侵略者

(公安局史志供稿)

抗日战争时期 我县对敌斗争中的敌伪工作

朱成震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那几年，是我鲁西广大军民对日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敌人也最嚣张、最狂狷，他们在其占领区大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建立所谓治安区与准治安区。在军事上，密布碉堡、挖封锁沟，修封锁墙，收买汉奸建立伪武装，对我抗日武装及解放区实行蚕食清剿。在政治上，积极建立各级伪政权，办“良民证”，实行保甲连坐法，到处张贴“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大东亚共荣”等标语，妄图实现其以华

治华的迷梦。他们在经济上实行资源掠夺，横征暴敛，对生活用品实行统筹配给，强行推行伪纸币，借以聚敛财富，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并实行奴化教育，开办日语讲座，提倡尊孔，同时收买汉奸，建立特务组织，派暗探，安坐探收集我抗日军民情报，四处烧、杀、抢、掠，妄图扑灭我广大军民燃起的抗日烽火

那时我东阿县的对敌斗争环境也越来越恶化，到四二年春，在我县境内，敌人已安设大小据点四十七个，建起了县、区、乡、村各级伪政权，与此同时组建起三个伪警备大队，共辖十五个中队。另外还有警察队、巡警队、宪兵队、特务队、手枪队各一个，总计约二千三百余人，另有驻东阿县城日军司令部所属之百余日军。除警、宪、特各领导机关驻在县城，警备队则分驻各个据点，伪区公所建中心据点，驻一个伪中队与一个日军小队，其余据点只驻伪军。为破坏我抗日军民的抵抗活动，敌人还在我县黄河西岸地区挖了东西

两条、南北三道封锁沟，一条从西南阳谷至东北齐河的公路穿越我县，这样把我县境切成许多小块。

当时呈敌强我弱之势，斗争形势相当严峻，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我县也实行了精兵简政，减少非战斗人员，部队化整为零，实行小部队活动，并相继组建起武工队、除奸小组，同时，成立了敌伪工作部（敌工部），由韩雁北任部长、史光为干事、黄玉成任会计，还有邢文泮、马春山、王子明和三个通信员共九人组成，受县委与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敌工科领导。三团副团长梁仁魁，在我地养伤，按政治部指示，和敌工部配合工作，卓有成效。

尽管敌人貌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已是强弩之末，弱点严重的暴露出来，其表现为兵员严重不足，主要依靠汉奸、伪军维持其对占领区的统治。再者，敌人为维持其不义之战，弥补其财力的不足，对我广大人民进行敲骨吸髓般的掠夺与搜刮，牛马般的奴役与蹂躏。这国仇家恨，激

起了我广大人民对敌人的恨，对祖国的爱，在我党的宣传教育下，积极拥护抗日，支援抗日，参加抗日，逐渐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敌工部则推波助澜，最终将敌人淹没。

敌工部建立后，在县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首先选择目标即工作对象，主要是伪军、政人员的大小头目，在敌工部的统筹安排下，从我党县委书记、县长到一般抗日群众，党政军民学，人人作敌伪工作。先通过敌伪人员的各种社会关系：家属、亲朋、同族、同乡、同学、同事等，给他们捎口信、写书信宣传我抗日政策，教育他们同情抗日，多做有利于抗日的事，不做或少做不利于抗日的事，不当死心塌地的汉奸，待其思想转变，时机成熟，再由敌工部工作人员直接与本人见面，进一步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与政策，视其本人具体情况与客观条件提出我们的具体要求与希望。

当时宣传的主要内容首先是以抗日救国为中

心的爱国主义教育，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揭露他们犯下的种种残无人道的滔天罪行。认清当亡国奴的痛苦与可悲下场。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胞兄弟不能互相残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多做有利于抗日的事；其次是前途教育，向他们讲清，日本侵华必败，我们抗日必胜。抗日前途光明，全家光荣。为虎作伥，甘当汉奸，众叛亲离，死路一条。

为了便于宣传，我们拟定了一些口号写在路旁墙上，贴到敌人碉堡附近。同时还印制上面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抗日同情书》，送给那些同情抗日的敌伪人员，规定持有此书的人可以受到我们的优待。并建立敌伪人员“黑红功过簿”，凡作一件有利抗日的好事记一红点，作了坏事则记一黑点，黑点多者即给惩罚。所有这些对分化瓦解敌人都起了不少作用。

我们敌伪工作的具体政策是保护先进分子，团结争取中间分子，打击顽固分子，镇压铁杆汉

奸，同时我们还派人打入敌军内部及区、乡伪政权内，搜集情报，瓦解敌人，发展抗日组织及共产党员。

为了打开局面，威慑敌人，开展工作，我们首先打击坏中坏，第一个目标是日本平井宪兵特别工作队驻铜城的队长孟广福，此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七·七”事变前是国民党东阿县警察局警长，日本侵占我东阿后，他即卖国求荣，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劳，被平井封为特工队长，从此更加猖狂，破坏我党组织，逮捕残害我抗日干群，我们对他多次提出警告，不但置若罔闻，反而威胁给他捎信的同志“谁私通八路我就枪毙谁”，他既威胁我抗日干群的生命安全，也影响我敌伪工作的开展，许多伪人员，看到他那不可一世的样子都取观望态度。为此，经县委研究决定除掉这只“狼”。由县公安局侦察股长，武工队长张醒民同志带领谭子清，袁子荣、曹立英、杨兴彬（一说是醒民、子清、子荣、杨继贤、孟英、陈金贵）五

人去完成任务，他们经过周密侦察、研究，在我地下情报员秦敦汉的大力协助下，订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尽管孟广福诡计多端，出没无常，枪不离身，甚至一夜换两地方，如惊鸟狡兔，但终被我抓住战机将其击毙在他小老婆的炕上，并将我方历数其罪恶的判决书放在他尸体上。孟的死对敌伪人员震动很大，许多敌人变的老实了，连后来派来接替孟广福的队长王德芳来了也主动与我们联系，借此机会，我们积极开展工作，局面打开了，不久我们又镇压了四区伪区长王玉恭。四三年我县久旱不雨，麦子颗粒无收，而敌人仍然逼老百姓每亩交纳八斤八两半麦子。为了保护群众利益，组织抗粮斗争，并想通过对伪区、乡人员的教育让他们协助，至少不逼群众，不破坏这次斗争。为此我四区区长王仲范给王玉恭捎信希望见面共商对付敌人的办法，王玉恭充耳不闻，仍按敌人的意旨办，他认为躲进陈店子据点里我们没办法。我们看他顽固不化，认贼作父，决定除

掉他。不久由四区区长王仲范与书记杨森带领区小队，趁王去东阿镇送粮之机，在侯庄伏击成功，将王活捉，由我县政府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这下子把伪区乡人员吓坏了，他们都积极表示明里应付日军，暗中支援八路军，大部分成了两面政权。王被处决当天铜城五区伪区长周霖庆就派人找敌工干部史光联系。陈店子一通信员卓某某，偷带出一支手枪埋到地里捎信让我们取走。我们还先后镇压了向敌人告密十八名共产党员名单的地主特务分子杨中荣，警备队中队长张仙州，叛徒周庆印、郎笑山、刘美冉等人，每个人在执行时都将其罪恶“拉出清单”一条不少，这使那些较坏的有所收敛，那些中间的则开始倾向我们，许多人都表示愿意作有利于抗日的事。有的送情报，有的为我们偷偷筹集武器、弹药及医药用品，形势逐渐好转。

我们在工作中凡能争取的尽量争取，变敌为友，增加抗日力量，除非杀不可者尽量不杀。如

陈店子据点伪中队长赵中清外号赵二虎，绿林出身，脾气暴躁，既心狠手辣，又重江湖义气，他手下有三百多名全付日式装备的伪军队，地处我冀鲁豫军区去一分区之要道，对我们是一大威胁。为打通这一交通要道，我们决定争取赵二虎。经过了解，赵曾与日本宪兵队长平井翻过脸，与汉奸警备司令刘德超摔过手枪，我们决定利用敌人内部这一矛盾，利用李振元曾与赵拜过把兄弟这一身份，陪同梁仁魁、韩雁北直闯虎穴，义正辞严地晓以大义，示以利害。经过一场剑拔弓张、唇枪舌剑的斗智斗勇，终于降伏了这只虎，并给他一份《抗日同情书》，他表示一定改恶从善，及时向我们提供敌情。我们也表明只要他说到做到，一定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谁知第二天我们走后，上午陈店子集上，刚转移到此地的冀南军分区侦察连战士打死了赵部七、八个伪军，这下赵二虎急了，怀疑我敌工部有诈。为了争取他，军分区首长批准把那天缴的枪支弹药如数归

还给他，并以抗日政府的名义给伪区长写了一封信，要他们给赵部每个死者家属抚恤金一百元（伪钞），买棺材一口，送回原籍安葬，一切费用白区公所承担。并告诉他冀南侦察连行动前了解了些情况，都说你坏，这次是专来杀你的。他听了又是怕又是感动，决心站在抗日一边，从此他确实做了不少有利于抗日的事，最后被日军杀害。

由于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以武装部队作后盾，敌伪工作顺利展开，到四三年底，在各伪军中队，伪区公所以及大小据点里，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工作关系，在敌人内部还发展了部分党员，这时，东阿这片土地上已形成有敌人无敌区的大好局面，为解放全县夺取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县敌伪工作的成绩，具体说来有几点，一由于我们能及时得到敌人活动的准确情报，所以能采取有利措施。如敌人强大，我们则组织群众坚

壁清野，提前转移；敌人较弱，我们则组织兵力给敌人以有力打击。这既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也减少了我军不必要的损失。如一天陈店子赵二虎送来情报，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百多人，带大车一百辆去古官屯一带抢粮，据此我们在曹孟庄组织兵力伏击了敌人，使敌人损兵折将，抢粮计划落空。

二、掩护了我军政干部，减少了损失。如在一次敌人扫荡时，李建民同志碰上了敌人，立即躲进了官庄据点，由伪军小队长解克明掩护起来。日军发现有人进了据点便进去搜查，并架起机枪相威胁，结果也未查出。李建民同志在伙房里烧水安然无恙。还有梁仁魁同志负伤，便安排到王小楼据点里养伤，还跟着一个医生，直到伤愈。区长谭西三，在敌人大扫荡时住进敌人据点里；我武工队员袁子荣被捕，通过敌伪关系很快被放回；我们有时就在敌人据点下面的村里开会，这更保险。

三、给最后拔除敌军据点创造了有力条件。

我县河西境内的据点没有一个费力强攻都逐渐拔除了。如四四年春我决定拔除铜城据点，打通张、濮、范、观的交通要道，部队布置好后，上级派史光去见伪中队长黄济民，通知他说，我上级决定今晚拔除这个据点，要你们撤到陈店子去，允许带走私人财务与武器。晚上我们在西关一打枪，敌人就出了据点，他们怕遭我伏击，由我们护送他们。当时因敌人还有相当力量，如果打垮，他们还会组建新中队，不如暂时留着为我利用，待时机成熟时再解决。象铜城这样一个大据点只费了一点子弹就拔除了，还有几个据点也是这样拔除的。

四、在我抗日军队战斗力逐渐增强，日军已面临末日之际，我以强大军事力量作后盾，通过敌伪工作关系，促成敌伪三个中队主动起义参加我抗日队伍，推动了其他伪军的反正，加快了全县的解放。如苦山据点有三个伪中队，在曹洪文的积极配合下，首先设计镇压了铁杆汉奸十五中

队长张仙州，于四四年四月促使三个伪中队全部起义，接着斑鸠店伪十四中队起义，同年夏鱼山据点伪六中队及前来增援的伪八中队同时起义，最后一千多起义人员在西程铺改编为抗日独立支队，归军区三团领导。三团派来四名军政干部，即支队部张参谋、曹洪文连吴指导员、赵鸣九连李指导员、邢兆荣连文化干事单忠，至此东阿河西地区全部解放。

回顾我县敌伪工作所以取得较大成绩，有几条基本经验。一是在县委领导下，敌工部具体组织，党、政、军一齐抓，广泛发动群众，把敌伪工作当作对敌斗争的重要方面。二是正确掌握政策与策略，即不分阶层、出身，抗日一家，凡能争取的尽量争取，只要少做坏事，不与我为敌就要争取。即使对顽固分子也是先警告后镇压，做到镇压一个教育一批、争取一批。三是充分利用日伪军、政人员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亲属关系。因为他们大部都是本乡本土，先教育争取这些人效果

显著，我们通过伪警备司令刘德超的副官王子雅搞到一份伪军花名册，工作更加方便。四是有抗日政权与武装作后盾。武工队、除奸组的密切配合，我区、县武装的支援，特别是军分区三团的支援起了重大作用。

总之，我县抗日战争中的敌伪工作成绩显著，经验也是多方面的，值得认真总结，值此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仅一此文作为纪念。

注：本文作者，系党史办工作人员，参考了秦延彬、梁仁魁、史光、曹洪文、李雷峰、王仲范等同志的回忆录，综合成文。

献石修堤战顽敌

汪雨亭

东阿县黄河堤防，在解放前是修守北金堤。解放后，根据1946年6月冀鲁豫行署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菏泽召开的第一次治黄会议的布署，加修了临黄堤。临黄堤是原来民修民守的小民埝，相当于现在的生产堤。自修守临黄堤后，就缩窄了河道，大大降低了排洪能力。如艾山河道仅300米宽，而且对岸平阴县河岸是山连山的石山区。也就是说东阿县的土堤对着平阴县的石山。另外，东阿堤防上首，对岸是东平湖水库。当上边来洪水，超过东阿以下河道排洪能力时，即利用东平湖分洪，但是，东平湖的分洪闸是侧向的，能否达到预计分洪量，无绝对把握。如果达不到预计的分洪量，那就首先加重了东阿县堤防的防洪任务。因此说，东阿县黄河堤防是关系重大的重要堤段。

东阿黄河堤防管理机构，是随着省、地、县区划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在1952年以前是两个段：徐翼黄河修防段，堤线自陶城铺至艾山共52华里；艾山以下为东阿黄河修防段，堤线长62华里。于1948年底撤消了徐翼县，合并到东阿县。修防段改为东阿黄河一段和东阿黄河二段。

东阿县黄河修堤是于1946年6月开始的。因为国民党加速花园口堵口工程，要使黄河回归故道，以水代兵，分割解放区，于1946年6月3日，我冀鲁豫行署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菏泽召开第一次治黄会议，布置了修堤任务，主要是修补残缺，东阿县和徐翼县都在六月中旬动员民工上堤施工。那时正是麦收大忙季节，群众自带挑篮、抬筐、铁锨，是义务性质的劳动，每工2.5市斤小米。当时修堤是在国民党飞机轰炸和机枪扫射，以及对岸敌人干扰破坏下进行的。都是利用夜晚施工。打碾有声音，对岸敌人听到就打枪，民工就用石滚轧。在这样困难危险的情况下，上堤一

万多民工，施工不到一个月完成土方约50余万方，将原来千疮百孔残破不堪的小埝，全面地整修起来。

整修险工砌坝工程是与修堤同时开始的。但是整修险工砌坝工程，比修堤更加困难和危险。第一，我们没有物料；第二在河道滩地施工，对岸敌人打枪不好隐避。我们在党中央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锹，向蒋黄作斗争”的号召下，发动群众，开展了献石运动。1946年至1947年，两年间两个段共收到群众献石达5万余立方米，据说群众有的把庙宇拆掉，有的把自己祖坟上的石碑拉倒，有的把自己家里的供桌石、捶布石，堵鸡窝的石头都献上。那时群众的觉悟是相当高的。在整修险工砌坝时，多是与修堤一样夜间施工。往坝上运石料，大块石几个人抬，小石头采取人接人排队传送的办法。最困难是砌垒时不能有声音，一有声音对岸敌人就打枪，我们的工人有时把石头先放到脚上，再慢慢按到石坝上。一

不小心，发出声音，就引起对岸敌人打一排子枪。工人们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经过两年奋战，把全河砌坝工程基本上胜利完成，把原来稽料坝都改成了石坝。

1948年10月20日，我们正在东阿县八里庄修防处住地，开1948年防汛总结会，半夜接到通知说：“黄河发生大洪水，会议暂停，各回本段进行防汛。”我刚天明即到艾山以上老旧城险工，一看坝头已漫顶，我未回段部即马上到六区找到区委书记，请他带领2000民工，送稽柳料各10万斤做抢险之用。我回到段部，又通知五区民工上堤2000人，稽柳料各20万斤，经过十昼夜的战斗，才战胜了这次洪水。这次洪水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十月下旬来这样8000多秒立米洪水，是历史上少见的；第二，暴露了东阿堤防险工防洪能力相当差。

1949年9月，陕县水文站发生12300秒立米洪水，到达东阿，高水位持续时间达40天之久，堤

顶超过水位不足1米，险工坝大部漫顶，坝石不断坍塌蛰陷；大堤背面渗水漫涌到处皆是，形势相当紧张，聊城地委副书记周海舟同志和东阿县委书记宋云同志，都亲临黄河，坐镇指挥，调集一万多民工上堤防守，采取水涨船高的办法：大堤高度不足，就加修子堤；石坝漫顶的，就加修土坝基，用料围护；石坝坍塌，就抛石抢护；大流顶冲堤身的，就抢修秸料坝；大堤背坡有滑坡现象，就抢修堤戗垛；背河渗涌严重的地方，就用麻袋装土，把渗涌地方围起来，中间压砂子，使水渗出来带不出泥土。我们就这样战斗了40个昼夜，化险为夷，取得防洪斗争的胜利。

经过1949年9月，12300秒立米的洪水考验，我们堤防险工坝工程，相当薄弱，不能保证不决口任务的完成，因此黄河水利委员会，报请中央水利部批准，进行第一次大修堤，从1950年开始至1957年完成，主要任务是修补残缺，加固堤防薄弱环节，为确保陕县水文站23000秒立米洪水

不发生溃决，要求堤高超过1949年洪水水位4米，堤顶宽7—10米，东阿大堤是平工7米，险工9米，并用粘土包边盖顶。堤坡1：2至1：3，东阿段是临河1：2.5、背河1：3。这次大修堤，东阿段是采取分期分段，集中施工的办法，对民工开始是采取征工包做的办法，于1951年改为自愿包工的办法。东阿段经过1950年、1951年、1952年三个春冬，基本上完成了大修堤的任务，以后主要是整修坍塌工程，共完成土方，东阿一段是220余万方，东阿二段完成270多万方，共计约500万方（这个数字是回忆的，不一定十分准确）。

这次大修堤对民工工资政策，是多劳多得，土工按方计资，砌工边铣工是分等给工资的办法，计资单位标准，1949至1951年是小米，以市斤为计算单位。1952年改为人民币后，以万元为计算单位。到1954年国家实行币制改革后，改为以元为计算单位。土工工资标准，以运距100米运土一立方，给小米2.625市斤，远于或近于100

米其增减数为70米以内按6%计算，每级递减0.1575市斤；70米至200米按5%计算，每级减或增米0.13125市斤；210米至400米按4%计算，每级增米0.105市斤；410米至600米，按3%计算，每级增米0.07875市斤；600米以上按2%计算，每级增米0.0525市斤。碓工：特级、每人每日小米10市斤；一级，每人每日小米9市斤；二级，每人每日小米7.5市斤；三级，每人每日小米6.5市斤；四级，每人每日小米6市斤。

边铣工，与碓工相同，也是按等级计算工资。我于1952年9月调平原省黄河河务局工作，离开了东阿。

东阿人民，献石修堤战恶魔，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值得表彰和纪念。

注：汪雨亭同志，又名汪庆霖，现年76岁，长清人，1939年参加工作，40年入党，41年至52年，先后在河西县、东阿县任区长、黄河段长，后调黄河水利委员会先后任副处长、处长、顾问直至离休。现居郑州。

刘 海 涛 传

文 史 科

刘海涛同志，原名刘保仁，山东省东阿县刘集镇张集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日，在沂蒙山区反扫荡激战中，牺牲在日寇的屠刀之下。

海涛同志，生于祖国多难之秋，家境贫寒。父亲刘长成，曾在河东窑头村私人酒坊作工，挣几个钱供给他读书。他是长子。二弟保义，在家务农一生；三弟保页（又名海涌）去东北谋生，落户辽宁开源。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勇敢斗争，富于反抗精神。一九二七年，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只身离家去东北。为生活所迫，和别人搭伙，做伐木苦工，后又在哈尔滨一带，跑单帮做经营猪鬃生意。由于他疏财仗义，同情人民，结识了不少穷苦朋友。有次他去珠河县看望一个

朋友，恰逢该县警察所一名警察被杀，县警备队正在搜捕凶手，趁机打家劫舍，抢掠百姓。他仗义执言，为民不平，惹恼了警察，指良为盗，将其捕至官衙，硬逼他承认是杀人凶手，受尽了残酷的折磨，严刑拷打，始终不屈，被扣到警察所牢房。他的朋友和同乡，凑钱托人，将其赎出。保释出狱后，在穷苦乡亲的调养下，养好了伤，已一贫如洗，食宿困难。这耿直的山东汉子，受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影响，深深懂得，穷人要生存，不受气，必须奋起抗争，梁山英雄的义勇行为激励着他。他联合了二十余个弟兄，于某夜手持木棍、斧头，偷袭了警察所，打死了骑在人民头上滥施淫威的警察头子，夺得了十几条枪，连夜带领一些穷哥们，走进了深山老林。

逼上梁山，揭竿起义后，专门和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作斗争，做了不少杀富济贫的侠义事，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队伍很快扩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日寇占领了我东三省，民族

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反对日寇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他率部加入了哈东比较有名的孙朝阳义勇军。孙朝阳虽是“文明胡子队”，但较多流寇习气，“绿林好”作风，只能流窜山林，不能和日寇抗衡。一九三二年中共满州省委军委赵尚志组建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失败后，遭受左倾分子沉重打击，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只身从哈尔滨来到宾县，加入了孙朝阳部，当一名马夫。后，孙朝阳被困于宾县东山，孙用赵计，以攻为守，赵率部攻取宾县城，迫使敌人撤围，得孙信任，用为参谋长。赵尚志吸取前段教训，积极在孙部中开展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号召战士跟党走，团结抗日，拯救国家，使刘海涛第一次接触了党，受到了教育。七月，赵会见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代表崔钟鸣，和派驻孙部的地下党员李启东接上了关系，他们秘密建立了党组织，刘海涛被吸收为党员。不久，敌特打入孙部，诱骗孙朝阳进关“面议抗日大计”。赵、刘等识破敌人阴谋，劝孙

无效，并欲加害赵等，经研究决定，刘海涛随赵尚志立即脱离孙部，找珠河中心县委去了。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在三股流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选举赵尚志为队长，赵带领刘海涛等队员庄严宣誓：“我们珠河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恢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为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出东北，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

新生的珠河反日游击队，威震哈东地区，人民把他看作民族抗日获胜的希望。不少义勇军中的爱国士兵和山林队员纷纷投奔，力量迅速壮大，一九三四年春，为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游击队联合了大批抗日武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司令部，刘海涛所部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委，下设三个总队，赵兼率第一总队活动在宾

县一带，李兆麟率二总队出道南活动，韩光率三总队出道北活动。第一总队下设八个大队，刘海涛任一、三、七大队长。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山林队和义勇军，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兼一师师长，刘海涛任一师一团团长。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所率一团，在延寿、方正地区，给日伪以沉重打击。攻打方正一战，吓得敌人撤回了讨伐队去守城镇，从而粉碎了敌人的春季“讨伐”。五月赵率刘海涛团及部分联合军，东征到牡丹江沿岸，开辟新区，准备打通与汤原游击队的联系，以便组织松花江两岸整个北满地区的联合作战。东征途中，攻克了半截街、新开道，收缴了老五团，楼山等警察局武器。日寇发现我军东进，立即前堵后截，刘海涛所部，利用山区有利地形，依靠群众支持，狠狠打击了跟踪我军的白俄森林警察队，摧毁了掠夺我森林资源的近腾林业公司和森林铁路

车站，又进攻三道通，击溃伪军赫团。哈东抗日战争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日伪北满统治中心哈尔滨。这年夏季，敌人制订了毁灭哈东根据地毒辣计划，进行灭绝人性的讨伐，实行三光政策，形势十分严峻。九月十日，珠河中心县委议决，我主力转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第三军扩编为六个团，刘海涛所率一团，游击到方正县大罗勒密山区，十月，与赵尚志远征主力会合。根据“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使其成为北满抗日游击运动的军事集中领导机关，有力地领导了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九三六年刘海涛受上级党的派遣，去苏联学习，同去的有当时珠河县团委书记朱新阳（现居哈尔滨，曾任旅大市副市长）。他到苏联后，被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王明、康生）分派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和韩光（国家建委主任、中纪委常委书记）同班。一九三八年，

他与韩光一道回国，到达延安，受到党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五月，受党中央派遣，随郭洪涛所率大批干部来山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山东根据地，使山东真正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刘海涛在太西领导武装抗日，任太西支队司令员。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为统一山东地区各支队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指挥，江华任政治部主任。山东纵队辖第二支队（司令员刘涌，政委景晓村）；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副司令员杨国夫，政委霍士廉）；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副司令员赵杰，政委林浩）；第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政委朱澄）；第六支队（司令员刘海涛，副司令员何光宇，政委张北华）；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包括原第七、第八支队，指挥马保三，政委张文通）；陇海南进支队（司令员钟辉，政委梁海波）；人民抗日义勇

军第一总队（总队长张光中，政委李乐军）；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队长李贞乾，政委郭影秋）；第十二支队（政委张岗，副支队长钱钧）；特务团（团长陆午勋，政委王云生）；临郑独立团（团长薛浩，政委韩去非），这时的刘海涛，已在我党我军中成长为一名重要领导人。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旬，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整编，编成十个支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支队、挺进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三个团（特务团、临郑独立团、直属四团）。刘海涛任九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刘其人。

一九四〇年春，山东解放区奉命划为鲁中、鲁南、渤海、胶东、滨海五个行政区。二月一日，建立中共山东第一区党委，辖鲁中、鲁南、鲁东南三个地区，林浩任书记，魏思文组织部长，林乎加宣传部长。林浩和九支队司令员刘海涛、政委刘其人等同志，奉命率部进入滨海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给日寇沉重打击，使滨海根据地不断

扩大，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一九四〇年九月中旬，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山东所属部队再次进行整编，整编后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副指挥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江华，参谋长罗舜初。下辖五个旅，四个支队。其中第一旅（原鲁中部队）旅长王建安兼任，周赤萍任政委；第二旅（津浦支队九支队）旅长孙继先，政委江华兼任，副旅长是刘海涛；第三旅（原清河部队）旅长许世友，政委刘其人；第四旅（四一年补建）；第五旅（原胶东部队）旅长吴克华、政委高锦纯。四个支队是：第一支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王子文；第四支队司令员赵杰，政委王一萍；第五支队司令员王影，政委王文；独立支队（即沂蒙山支队）朱则民任政委。刘海涛所在的第二旅，活动在日照、莒县、赣榆、沐水等县。

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为适应战争需要，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全省划分为胶东、清河、冀鲁边，鲁中、鲁南、鲁西六个战略区，刘海涛任鲁中军

区司令员，这时，日寇正集中大量正规兵团和伪军，对我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猖狂进攻，到处修碉堡，挖封锁沟，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灭绝人性的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使我抗日军民遭受到难以想象的迫害和摧残。我山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响应党中央“咬紧牙关，渡过难关”的号召，团结一致，敌汽同仇，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表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高尚品德和英雄气概。

一九四一年冬，日寇集中了五万余人的日伪军，对我沂蒙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寇侵华司令畑俊六坐阵临沂城，亲自指挥四个师，分八路对我鲁中地区进攻，实行所谓“拉网战”、“篦梳战”，妄图将我抗日军民统统消灭，实现其霸占中国的野心。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兵力之多，时间之长；手段之毒，都是空前的。日寇所到之处，狼烟滚滚，火光熊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历时七周，在我军民浴血奋战下，终于粉碎

了敌人的这次大扫荡。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和波兰友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希伯，山东省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子超等数百人，于十一月二日的反扫荡中壮烈殉难。刘海涛同志的爱人、部队卫生工作人员黄风芝和即将出生的孩子，也同时牺牲。

刘海涛同志，生于祖国多难之秋，为了抗日救国，探索前进，终于找到了党。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我军的指战员，转战南北，驰骋疆场，在马背上渡过了十几个春秋，正当壮年报国之时，为国捐躯，战死于日寇的枪弹下，其生也勇，其死也烈。豪气与日月同辉，英名与天地共长。“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刘海涛同志的光辉业绩，将为故乡人民留下永远的纪念。

人们为了纪念长眠地下的抗日先烈，缅怀刘

海涛等老一辈革命英雄，在沂蒙山区满山遍植青松翠柏的万松山，建立了烈士陵园，安息着1885名英灵。这里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八路军鲁中军区，于一九四三年开始修建，一九四四年二月建成。五月日寇炸毁了“抗日烈士碑”身，陵园遭到破坏。一九六五年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重修和扩建，仿照原碑文笔迹重刻。其碑文如下：

抗日烈士纪念碑序

自抗日战以还鲁中建军，卫国卫民杀敌致果，英勇健儿前赴后继，七载征劳如一日。英雄百战无倦容，铁衣磨绽，征戈几易。克尽杀敌之天职，惟念父老之疾痛。卧薪尝胆，茹苦饮辛。暴敌虽残，难胜正义之师。敌寇扫荡之阴谋不遂，分割蚕食之毒计难逞。大块国土为我光复，辉煌战绩擢发难救。五井歼敌，开鲁中战功之先列，孙祖伏击，再征顽敌于猖獗。他如杨家横，太白山，青驼寺诸役，皆足以寒敌胆而励人心。

继续半程反扫荡，一举而拔除据点十七。于是军威远扬，敌伪侧目。三十年冬，敌集五百之师，扫荡沂蒙地区。布鱼鳞之阵，施铁壁之围，意在鲸吞，残暴绝极。赖我将士用命，视死如归，神出鬼没，致敌披靡。复以雷霆之势，连克垛庄、上店，粉碎环锢蒙山之谋。继拔铜井、薛庄，打破其蚕食压缩之围。残敌远避，鏖战以终。次年冬月，敌又虐两万，辗转网围。我军严阵，奋勇抗击。吉山一战，苦斗喋血。汪洋同志身先士卒，壮烈殉国气壮山河。继战悬崮顶联友却敌，敌焰虽炽，我阵如屹，同胞万余，免遭屠戮。对崮之役，轰轰烈烈，敌虽念倍于我，而我则以少胜多。马鞍山极，血拼数日，党军本色，尽忠尽义。垛庄两袭，敌寇遁迹。去春惠家庄首传捷音，破敌蚕食。继战湾头，痛快淋漓。锤击胡庄，无一漏网。三官庙、乔家庄战斗独创风格，军事与政治相济。复手而得歪头崮壮举，解友重围，大仁大义。史无前例，仲夏暑义旗北指，痛

扫群丑，纵横如意。一战白纱，吴伪挫败。再战梁山官庄，历逆溃遁，廓清沂山地。东出诸安莒，解人民于倒悬，拯饿莩于垂危，涝坡告克，万民称庆，一变人间地狱而为自由之土。初冬霜冷，寇师卷土，两万之众泻于北蒙之隅。岱崮英雄，坚守制敌，竭疲敌力，左右敌趋。苦战两旬，敌焰以挫，坚忍忠贞，堪称所表。冬季战役，大张挾伐。专势浩宏，痛剿吴逆。我英雄健儿勇猛扑搏，冲锋陷阵，势如破竹，直捣心腹，伪势支离，我奏凯歌。凡此胜利，书不胜书。我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与开展，父老兄弟诸姑姊妹亦复得生息教养，而新民主主义建设之基业，于以奠定，此皆我忠勇将士，为国为民流血牺牲所致也。赞胜利之辉煌，念先烈之芳迹。大哉伟哉，身死云乎哉。值兹相持阶段最后一年，希魔复亡在即，日寇丧钟已鸣，胜利在望，当步芳尘而迈进。建成斯碑，昭彰英烈，万世流芳，以励后继。汶水滔澜环其前，沂山巍峨屏其后，构成雄伟之

势，以期永垂。

八路军山东鲁中军区司令部
政治部

公元一九四四年二月建

解 承 生 烈 士

贾 兴 强

解承生同志，一九二〇年七月，出生于我县陈集乡解庄一个贫农家庭里。父亲解长修是个石匠，在本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较早。在父辈一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幼小的心灵里，逐渐懂得了穷人受苦的根源，萌发了反压迫、求解放的思想。他小时候上过几年学，后来由于家境贫寒，被迫辍学，全家靠糠菜充饥。他整天挎着篮子，挖野菜，拾柴禾，帮助家庭苦熬岁月。有次拾柴时，从祖林地的树上，折了点干枯的枝丫，被地主族长看到，说他违犯了族规家法，痛打一顿，还要重重

处罚。这时日寇已入侵我县，到处修碉堡，安据点、蹂躏百姓，国仇家恨交织在一起，使血气方刚的解承生，毅然投到了八路军七团的怀抱，当上一名抗日战士。

解承生从小就受旧社会苦难生活的折磨，爱练武功，有一股反抗精神，常以棍棒作刀枪，以大地当战场，力图练就一身武功。一九三八年入伍后，又接受了党的教育和人民军队的培养，逐渐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战士和武工队长。一九四四年入党后，更加勇猛善战，不怕牺牲，先后和平阴、阿东、平阿公安局武工队工作，一九四七年冬，丁坞战斗胜利结束后，在大羊一带遇难，时年二十七岁。

他参加革命后，多次立功受奖。他的英勇斗争、敢于拼搏的精神，受到干部、战士的一致称赞，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解大拼”。至今人们提起他来，他的光辉形象和英雄事迹，立刻就一幕幕呈现在我们面前。

定时取匪首

解承生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果敢，言必信，行必果。每次有艰巨任务，他都主动请战，争先报名。对领导立下军令状，说到做到。特别令人佩服的是，要惩处哪个坏蛋，事前发出声明，任你严加戒备，也难以逃脱。

一九四三年秋，为保卫牛角店高级小学我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上级决定除掉牛角店据点内，铁杆汉奸小队长胡玉峰，惩一儆百，大煞敌人的威风。胡玉峰是这个据点三个小队长中最坏的一个，除掉他还可以争取中间派，便于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先把除奸通告贴在据点门口：“三天内处死铁杆汉奸胡玉峰。”当哨兵把通告揭下来，拿给他看时，他气的大发雷霆，骂我武工队“吹牛，”并咬牙切齿的要和八路军武工队斗一斗。他还阴险的皮笑肉不笑的说：“我三天不出门，看你怎么办！”当

公安局朱迪局长问解承生有无把握时，他立即表示履行诺言，准时提着胡匪人头来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队长张杰又和解承生、邵苑顺、赵殿臣同志，共同研究分析敌情，制订切实可行方案，组织其余同志配合作战。他们化装成贩粮商人，推着三辆小木轮车，上面装着几袋粮食，连推带拉的，来到据点斜对门的张家饭店待机行动。这时太阳快压树梢了，胡玉峰以为三天将过，平安无事，武工队不过是吹牛吓唬人，三天来他没敢出据点骚扰百姓，馋的有点受不住。于是带一护兵，东张西望的溜出据点。当他蹲在一个杂货摊前买花生时，解承生也装着去买花生，悄悄靠近，连发两枪击毙了胡玉峰及其护兵。我武工队迅速掩护解承生，带着缴获的两支短枪，离开了现场。

解承生通告三天除掉胡玉峰，话不虚传，按时兑现，震慑了敌人，分化瓦解了汉奸。牛角店据点内另一个汉奸小队长尹子明，被这事吓破了

胆，积极派人和我武工队联系，变成了我们的内线、向我提供情报，掩护同志，为抗日事业，做了不少工作。

智取敌酋枪

我记得那是在一九四三年正值秋收季节，鬼子汉奸天天骚扰，庄稼熟了无人收。为了打击敌人，保卫秋收，解承生奉命出发，侦察敌情。他打扮成一个小商贩，骑着一辆破车子，带一支土造匣枪出发了，当行至教场铺附近，看看快到敌人据点，检查武器时，才发觉枪栓不知什么时候在路上颠掉了，立即驳回，顺原路找。庄稼遮挡视线，未发现对面来了人，突然听到车铃响，他才发觉一个汉奸骑着自行车已到跟前，身背着一支新马枪。他急中生智，立即抽出没枪栓的匣枪，一把将其自行车推倒，大喝一下：“小子，你开枪已来不及了！动就打死你！把枪放下，后退五十步！”这个汉奸魂不附体，乖乖的放下武

器，举手后退。解承生马上捡起马枪，扶起敌人的自行车，并用匣枪指着他：“八路优待俘虏，交枪不杀，以后少干坏事，如再为非作歹，祸害百姓，决杀不饶。你骑着爷爷的破车回去向你主子报告吧！”“谢谢大爷，不敢！”“快滚！”敌人推起破车子，没命的逃走了。

一个月后，解承生单独出发去王镐店附近侦察，腰里别着一支土造鸡叨豆枪。发现远处来了个骑自行车的人，他化装成一个徒步赶集的农民，挎着一个篮子，沿着路边小心翼翼的走路。走近时，才发现来人是门鹤亭的护兵，背上的三把匣枪，在阳光下闪着蓝光。两人擦肩而过，解承生猛的抓住车把，举枪对准护兵的胸膛，喝令他交出武器。敌人慌乱无智，战战兢兢的将枪摘下来，挂到车把上，后退了几步。解承生指着他，教训了一阵，警告他今后要改恶从善，不做坏事，否则，决不客气，说罢，他挎着匣枪，骑着缴来的自行车，继续闯虎穴，去执行侦察任务。

年关逼近，冷气袭人。鬼子汉奸大肆抢劫、勒索百姓的财物，老百姓在恐惧不安的等待春节。朱局长为了警告一下敌人，并借过节之际搞点武器，装备自己，令解承生于腊月二十七日去赶牛角店大集，并说，要精心化装，谨慎行事，赶集的群众多，不要伤了老百姓。这天，他和战友们都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有的挎着篮子，有的挑着担子，也有的帮群众拉着车子，纷纷向集上走来。刚到牛角店圩首东边，发现伪区长石子恒的护兵石继才背一支匣枪，在群众中挤来挤去抢夺过节的东。他和战友邵苑顺悄悄靠过去，一人抓住他一只手，解承生将短枪抵住他的后背，轻声喝道：“不准叫，动就打死你！”集上人多，乱嘈嘈的。邵还用另一只手撮紧衣领勒紧脖子，他们象三个闹着玩的伙伴，拉拉扯扯的走出了牛角店，把敌人押回了我抗日区政府，交给了石大观区长。解承生以机智勇敢，又缴获了敌酋一支匣枪。

侦察遇敌探

抗日战争结束了，内战仍在继续，一九四七年四月，武工队住在柿子园，担负着阻击敌人任务。一天上午，张杰同志叫解承生去孙官庄侦察敌情。他带领一名队员，都化装成农民，爬山越岭去孙官庄，刚到村西头，就发现李学富店里有两个敌兵在喝水，仔细一看，一个是三区伪区长李树森的表弟，刚参加谍报队，还没领到枪，仅带两枚手榴弹；另一个是老谍报员，带着一支手枪，他们早就打过交道，是老相识了。解承生风趣的对同伴说：“咱还没下请贴，敌人早派人送情报来了，咱们快去道个歉！”两人一使眼色，经直向店中走来，进门后，解承生就来了个举枪礼：“不准动，动就打死你们！举起手来！”两个敌探被这突然情况吓昏了，吱吱唔唔举起了双手。另一名队员一个箭步上去，扯下了一支手枪和两枚手榴弹。解承生将枪一摆：“走罢，交枪不杀，武工

队有请，跟我们走一趟。”他们本想捉两个舌头，为我们提供情报，结果还没出村，趁拐弯之机，那个老谍报敌人逃跑了，这一个也赖在地上不走，情况十万火急，等敌人大批人马来到，就只好就地将这个打死，带着缴获的枪，迅速离开现场。等和群众接触，侦察任务完成后，安全的回到了驻地。

短暂的人生

解承生以对人民无限的热爱，机智勇敢的和敌人作斗争。常常只身闯敌穴，时时赤手战顽敌；立过无数次功，受过许多次奖。由于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不少奖状已随岁月消失。现仅有的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冀鲁豫一分区发给他的奖状，主要事迹是因他是年六月，一人杀敌六名，伤敌二名，夺枪一支，记功一次，上级党委予以嘉奖。

当他拿着这张奖状回家时，年迈的父亲，高

兴地鼓励他：“再接再厉，杀敌立功。”年青的妻子期望他“戒骄戒躁，继续向前”。当时妻子正给他做鞋，亲切的望着他，含情脉脉的说：“你明天走吧，今晚新鞋就能做好，”他四岁的儿子，也接着他的腿，连声喊着：“爸爸、爸爸。”他伸手抱起儿子，在他脸蛋上亲了一下，又递给妻子，坚定地说：“任务紧迫，不能停留，等打胜了这一仗，再来和你团聚一天。”贤惠的妻子理解丈夫，虽有一般女人的情爱，还是以革命为重，不拖丈夫的腿。他嘱咐妻：“要好好照顾老人和孩子，革命成功后，好好谢谢你。”

几天后，喜讯传来，丁坞战斗胜利结束。白发苍苍的父亲，带上儿媳做的新鞋和全家的嘱托，渡河去看望儿子。但当他到达部队时，首长沉痛的告诉：解承生同志和武委主任张杰同志，在战役结束后，去司令部领枪时，在大羊一带遇害。英雄的父亲，强忍住悲痛，对首长和同志们说：“承生为人民而死，值得！可惜太年青了。”在场

的人，听到这话，无不泪下，一致表示，要以解承生为榜样，将革命进行到底。

解承生以二十七岁的年华，为革命献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出生入死，万难不辞，他是智勇双全的人民英雄，虽死犹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激励着我的同辈和年青的一代，继续奋斗，建设祖国，去完成英雄未完成的事业。

谈古论今话邮电

王俊才

我国远古时代的通信，据考证很可能是采用“实物信”，即以物示意的办法。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等句，当时通行的是“实物信”，可见一斑。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及人们之间交际的增多，逐渐开始出现了各种有组织的通信方法。

邮电通信的发展概况，在我们国家可以大体

上分成两段，即旧邮电和人民邮电。

一、旧邮电

1、古代通信

电信技术是在十九世纪才出现的，古代没有电信技术，只有邮驿通信。

远在夏殷等朝代，在我国的海防重镇就设置了很多烽火台。在遇有外敌侵扰时，即在专设的高台上点燃烟火。各地诸侯见烟火即率部前往救应。秦代修建的万里长城上就筑有烽火台。据说我省烟台市的烟台山也是古代一个烽火台，烟台也由此而得名。

我国历史上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传说，可见距今二千七百多年前，即公元前七一一一年时，我们的祖先就已利用烽火传递信息了。然而，用烽火不可能详细地传递各种情报，而且从形式上讲也还带有“以物示意”的原始通信的痕迹，后来便被更严密的邮驿制度所代替。孔子“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的话，从侧面证

实了早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的邮驿通信不仅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是很快的。那时已专有驿马和邮车，用以传递官府文书。秦以后，“书同文”，“车同轨”，更促进了邮驿通信的发展。到了唐朝，邮驿分陆驿、水驿、水陆兼办三种，有驿站一千六百多处，连邮驿行程都有规定，如陆驿规定马每日走七十里，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据载，公元七五五年安禄山在今北京一带起兵反叛，遥距几千里之外的朝庭（京城在今陕西临潼县），六天之内便得知消息。可见当时邮驿通信的组织 and 速度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唐朝诗人岑参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这正是当时邮驿通信的真实写照。

到了宋朝，又将邮驿所用民役改为士兵，称“驿卒”，并设立了专门传递官府紧急公文和军情的“急递铺”。急递站铺相间十至十五里不等，骑马传递，每昼夜行程四百里。从事铺递的

人称“铺兵”。元朝因为军事活动范围的扩大，通信事业更为发展，仅在中国境内，就设有驿站一千四百五十六处，有驿马三十万匹。元朝还承袭宋朝的办法，在各州、县广设“急递铺”，全国有两万处，用日夜不停、铺铺接力的办法传送文件。明、清驿站基本沿袭旧制。到了清朝中叶以后，现代邮政逐步代替了古代邮驿制度。一九一二年驿站全部裁撤。

古时邮驿规模庞大，衔接紧密。那时的驿使（铺兵、驿卒）传递时往往携带证件，叫驿卷或信牌。驿卷有往返卷和单程卷之区别。信牌有金牌、银牌、青字牌、红字牌等，沿途行人见到带驿卷或驿牌的驿使，都要让路。各驿站都有驿舍，也叫邮舍或传舍，是过往驿使的途中落脚点。诗人孟浩然《泊宣城界》诗中“南陵问驿楼”一句，写出了当时的驿舍建筑，不只是平房，还有楼房呢。

两千多年来的邮驿通信，虽然规模发达，组

织齐全，在保卫边防和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它毕竟是为封建帝王和统治阶级服务的，直到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5年），为适应官府幕友和商人的需要，产生了一种商业性的民信局，寄递邮件、包裹和汇兑银钱，这是私邮，当时和邮驿制度并存，到清末发展最盛，直到一九三四年底才最后被取消。

我县的邮驿通信是随着全国邮驿通信的发展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县境内旧县、铜城二驿站是明洪武二年建立的，据康熙二十五年《兖州府志》载：“陆路上冲十驿”中，就有我县旧县，铜城二驿站，南接江南、徐州，北接东昌府茌平县，凡江南浙江、江西、福建、两广朝贡京师，皆走此道。自南而北，这十驿是：徐州利国驿、滕县临城马驿、滕县滕阳马驿、邹县界河马驿、邹县邾城马驿、兖州府城昌平马驿、滋阳县新嘉马驿、汶上县新桥马驿、东平州东原马驿、东阿县旧县马驿、东阿县铜城马驿而北六十里至

在平出郡境也。这说明我县境内的旧县、铜城二马驿，正处于京师皇道上。

据清道光九年《东阿县志》载：东阿为南北冲衢，四通八达，北一百里至茌平县茌山驿，南七十里至东平州东原驿此使节之所经也；东五十里至平阴县，西一百里至阳谷县，西北九十里至聊城县，西南九十里至寿张县，此邦国传达之所经也。里甲而外，置旧县铜城二驿。

旧县驿（明洪武二年设于城南旧县后迁治谷城，今东阿镇）原设驿马五十六匹，马夫二十八名馆库四名，馆夫二名，乾隆二十三年奉裁，拨赴直省马十六匹裁去马夫八名，馆库馆夫全裁，现存马四十匹，马夫二十名旧设驿丞一员管理，于顺治十六年裁。

铜城驿（县北四十里，明隆庆间知县田乐建二别馆于左右，自此北六十里茌山驿）原设驿马五十七匹马夫二十四名，馆库二名，乾隆二十三年奉裁，拨赴直省马七匹，裁去马夫三名，半馆

夫馆库全裁，现存马五十匹马夫二十一名旧设驿丞一员管理，于乾隆十五年裁。

东阿县除上述二驿外，还设有铺舍十五座司兵五十六名，即：

县前总铺一座（铺司一名，铺兵四名）。

南大路递铺三座：旧县铺（铺司一名，铺兵四名）棘程铺（铺司一名，铺兵四名）屯材铺（铺司一名，铺兵四名）

北大路递铺四座：旧城铺（铺司一名，铺兵四名）王村铺（铺司一名，铺兵四名）怀城铺（铺司一名，铺兵四名）教场铺（铺司一名，铺兵四名）

东路递铺一座：北市铺（铺司一名，铺兵一名）

西路递铺三座：鱼山铺（铺司一名，铺兵二名）关山铺（铺司一名，铺兵一名）桃城铺（铺司一名，铺兵一名）

西北路递铺三座：青苔铺（铺司一名，铺兵

一名) 归德铺 (铺司一名, 铺兵一名) 西城铺
(铺司一名, 铺兵一名)

2. 近代邮电通信

我国的近代邮电通信的发展, 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开始的。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 外国人经办的所谓“客邮”也相继渗入, 成为他们政治经济侵略的工具。1840年鸦片战争后, 签订了南京条约, 英国霸占了香港, 并强迫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先在香港设立邮政局, 又在各通商口岸设立了支局。到1907年“客邮”局所有英国的十处 (后来又增加野战邮局两处), 法国的十五处, 日本的二十一处, 德国的十三处, 帝俄的五处, 美国的一处。其中在山东境内的有美国在烟台一处、德国在青岛、济南、烟台各一处, 法国、日本、俄国各在烟台设一处。

“客邮”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1896年, 清政府企图通过加入万国邮会, 按照万国通例, 撤销

各国“客邮”，但帝国主义借口中国邮政设备不完善，拒不接纳。1903年清政府照会各国撤销在华邮政，仍毫无结果。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篡权，帝国主义侵华加剧。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会后，要求各国撤销“客邮”，仍没有结果。

海关是国家行政机构之一，但海关的职权限于对进出口货物检验和征收税金，并没有办理邮政业务的权限，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处心积虑，谋夺中国邮政的领导权，在1866年与总理衙门商定：在天津封港期间，凡是使馆和海关发送的邮件装在一起，交总理衙门代运；由上海来北京的邮件，总理衙门收到后立即送交总税务司开袋分装，赫德就此借题在北京、上海设立海关所属的邮务部门，并把业务活动延续到非封港期间。

1867年赫德发布邮政通告，公开邮寄外国人的信件，及后发展到收邮华人邮件。1878年起还陆续发行邮票。

外国侵略势力决不以控制一个海关为满足。海关设在通商口岸，其势力还不能伸展到广大的内地，并且海关邮政究竟不是中央政权所办，为此，赫德屡向清廷进行威胁利诱，说什么办理邮政可以为国家增辟财源，说什么如果中国自己不办邮局，那就能怪各国“越俎代庖”在华设立邮局。随即提出建立全国邮政的具体方案。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终于批准开办国家邮政。1897年2月20日，换上大清帝国邮政的招牌。赫德踌躇满志地对前任英国驻华使馆欧格纳说：“三十年的旧话，二十年的经验，终于成功了。”

英国独霸中国邮政，不能不引起其他国家的觊觎。大清邮政的招牌挂了才两个月，法国就照会总理衙门，说：“将来中国邮政局陆续推广，招募外国人员，其法国人员，亦应公平地令其同办”。后来竟直接了当地提出，中国邮政既然“让予他国最厚之利益”，法国也必须取得相应的条件。所谓条件便是“中国邮政局总管一缺，法

国人员补充”。清廷受到压力，答应“可允照办”。赫德鉴于法国染指中国邮政的态度强硬，也不得不寻求缓和之计，就在自己身兼总邮政司的情况下，于1901年把“邮政总办”职位让给法国人帛黎担任。

1909年赫德告老回国，清代国家邮政由英国势力操纵逐渐变为由法国势力操纵。

1911年，国家邮政由邮信部总管。清代国家邮政存续15年。

辛亥革命是中国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是不会彻底的。资产阶级在推倒了清专制王朝后，不仅不去摧毁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机构及其武装力量，甚至对清朝政府的王公贵族都优容礼待。如同大清帝国改为中华民国一样，大清邮政改换为中华邮政，中国的邮政大权仍操纵在法国代表帛黎手里。

这时，身受帝国主义欺凌、压榨的邮政员工，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各地先后

组织了邮务工会，暗中声援国民革命军，发起了驱逐洋人收回邮权的热潮。反动的国民政府，不仅不爱护中华邮政争取自主的努力，反而和北京军阀政府邮政总局的总办铁士兰（法国人）勾结起来，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签订了共管全国邮务条款十七条，由铁士兰兼任国民政府邮政总办，继续保存了帝国主义在中华邮政的势力。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我们山东的中华邮政和全国一样，邮政大权一直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直到解放前夕，任山东中华邮政局邮务长（局长）的纳自敦（瑞典人）才离开了济南。

电报电话传入中国也是同帝国主义的入侵相联系的。1865年，美国人从上海架设电报线路至吴淞口，之后，美国、丹麦、英国也相继在中国架设了有线电报通信线路。1879年，李鸿章从大沽口一炮台到天津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

1880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电报总局，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地设电报分局，开始架设天津——上海电报线路。辛亥革命后，由于军阀混战，为数甚少的线路也遭受破坏。1881年英国商人在上海的租界装用市内电话。1907年英国人在威海安装有百门市话交换机一部，这是山东市话的开始。1929年日本人在青岛安装西门子自动电话交换机3200门，长途电话是丹麦人最先引起的。1914年日本人架设了济南至青岛长途电话线路。不管是电报、市话还是长途电话，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都搞的支离破碎。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邮电通信才逐步走向正轨。

我县的邮电通信和全国一样，也是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的。民国十五年印行《通邮处所集》和《中国事务年报》记载，我县是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在县城（今平阴县东阿镇）始设邮政代办所的。据《中国邮政》载：“邮政代

办所之设立，普通因某地之营业尚未达设立三等局之时期，其业务与三等局所经营者相埒，亦经营普通信、挂号信、汇兑及包裹诸类，唯汇兑则非大款汇兑，而为小款汇兑，即每一汇票最多寄十元是也，如超过十元，则另开汇票，小款汇兑除收汇费较高外，受款人取款之手续亦异。至包裹之重量亦有限制，不若三等局寄递，可达二十公斤也”。故邮政代办所实具有三等局之雏形。随着邮驿机构的全部裁撤，于1914年6月30日（民国三年）在县城将邮政代办所改为三等邮局，到1917年（国民六年），在县内除县城邮政局外，又在铜城驿、斑鸠店、旧县驿建立了三处邮政代办所，至1926年（民国十五年）东阿县境内已有西王村、苦山村、王古店、斑鸠店、北十铺、教场铺、姜家楼、姜家沟、黄家屯、陈家集、滑口镇、香山镇、旧县镇、铜城驿等十四处邮政代办所。至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已有东阿至平阴（民国二十四年改为汽车邮路），东阿至东平

(民国二十四年改为汽车邮路)，东阿至茌平、东阿至阳谷等四条干线邮路和东阿至香山、黄屯、铜城、教场铺、北十铺、旧县镇、王古店、二十里铺、苦山村、阿城、张秋镇等，县内逐日邮班和黄屯至滑口镇的间日邮班及黄屯至姜家楼的三日邮班。另外，还有东阿至斑鸠店和西汪村的两条村镇邮班。至1946年（民国三十七年）旧邮局只有局长一人、信差一人、村差一人、邮差三人、雇差一人，这说明邮政业务仍是了了无几的。

据查我县电信始于清末民初，至民国十四年即有省有长途电话，民国二十一年县政府设立电话事务管理所，管理县有长途电话（即现有县内电话）。

据“交通史电政篇”载：“山东官电其始因河工而设，光绪二十八年刘旺庄突发险工，于工次组织电局架设电线直过抚署报房，是为创办河工电线之始……光绪三十二年中游官庄、香山险

工累出，复组织齐河县至上游十里堡电线二百三十里，四月于官庄香山各设电报分局一处”香山设电报局，这就是我县电讯的开始。“三十四年以东昌府一带地方不靖”，于香山展接支线至东昌，长七十四里即在府城设立分局，至民国三年（1914年）展接香山至前山线路一一七里。至民国九年十二月（1920年）展接东昌至临清线路100里。至民国二十年春放设蒲台、洛口、东阿黄河水底电缆三处。

据访问1929年至1934年间的香山电报分局芦绪斋主任讲：香山电报局隶属于山东省河工公电局，河工公电局及其隶属机构都是为黄河河工及黄河决口堵口子服务的，它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黄河建设，但也兼营军政电报和收受民用电报。

香山电报分局的电报线路，南通阳谷县的陶城铺再转范县、鄄城等地，北通齐河的官庄、齐河、洛口、济南河工公电总局。

在1927年至1934年期间，香山电报分局有四

个人，芦绪斋任主任，香山村的熊善邦任电务员，王进文（蒙阴县人）任电务员，还有一个工匠（即维修机器线路的工人）。

1917年——1927年期间，香山电报局主任是阮绍连，阮绍连的前任不清楚。

香山电报分局的人员，刚去学习报务的头一年叫电务生，没有薪金，一年后补上名子叫电务员，每月薪金4元，然后才能逐步提升主任。香山电报分局因主要是为黄河服务的，当时的局址是建在香山村东头大庙里，这个电报分局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建立至1934年国民党军队师长马洪奎的部下马腾文南逃时将电报机器和人员都带走，共持续了二十九年，至此香山电报分局就没有了。

据民国二十三年初版的《中国实业志》第七章电政篇记载：

“山东境内之长途电话分为国有、省有、县有三种，所谓国有者，系交通部经办之长途电

话，省有者系山东省建设厅经办之长途电话，县有者系县建设局经办之长途电话。”

山东境内之长途电话，以交通部经办者为最早，按交通部长途电话，共分若干区域，如京沪区、江苏江北区、河北区等，其在鲁省者亦复如此，取名济青区，以济南至青岛一段，为其主要线，查济青区长途电话之筹设，远在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前，在民国十四年五月间，全部电线架设完竣，开始通话。

济青各长途电话总局设在济南，分设局所二十四处，通话地点有：

莘县、冠县、馆陶，高唐、恩县、临清、武城、夏津、邱县、德县、德平、平原、陵县、临邑、禹城、东平、东阿、平阴、阳谷、寿张、濮县、鄄城、朝城、观城、范县、潍县、昌乐、胶县、高密、即墨、益都、临淄、广饶、寿光、昌邑、临朐、安邱、掖县、黄县、蓬莱、福山、周村、张店、羊角沟、烟台、龙口、枣园、刁家

庄、大汶口、旧城镇等五十处，这五十处中即有我们东阿县，这说明民国十四年五月（1925年）我县即通了长途电话。

山东省长途电话最初不营业，其目的专为军政方面传递信息而设，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时，政府以通话之县份渐多，大有营业之可能，遂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宣布营业。

当时我县县有长途电话已架电话杆路54.85里，电线65.55里，设置交换机三部，总容量为35门，安装话机十八部，通话的镇名有：斑鸠店、刘集、陈集，当时属平阴县管辖的旦镇、牛角店也通了电话。

据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山东省委任职公务员铨叙，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审查合格人员姓名册和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七日山东省政府公报第427期记载：东阿县电话管理所是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建立的隶属于东阿县政府建设科。当时的电话管理所主任是王福荣，临淄县人，年龄二十五岁，管

理员为朱正恩，东阿县人，年龄二十四岁。据民国三十一年十月日伪时期“东阿县公署三周年纪念年刊”记载：已架设完成之长途话线计有东阿至平阴（省有）东阿至少岱山、姜沟、鱼山、斑鸠店、广粮门、陈店子、大吉城、王古店、周庄、大寨庄、及广粮门至西程铺等11段县有长途电话线路，在县城已装电话的有县公署办公室、县长室、顾问室、日本宪兵队、日本警备队、警察所办公室、第一区公所、刘部队、新民会、汽车公司、电灯公司等单位。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二十二日东阿县政府（即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强占东阿县城）府业电字第一号呈报的：“东阿县电话管理所组织情形调查表记载：电话管理所主任张绍安、话务员李新华、谢华村、巡线员刘文宝、石棠见、姜光隆等7人，设有电话所至县政府和电话所至平阴两段电话线路，共计12公里”。

二、人民邮电

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就不可能有人民的邮电事业，我国人民邮电事业的萌芽就是随着人民政权的出现而产生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除在中央根据地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外，还建立了湘鄂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洪湖湘鄂赣根据地等，当时各根据地之间要沟通情况，取得联系，指导革命工作，就需要互相通信。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湘赣边区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赤色邮政，后来改为苏维埃邮政，在中央根据地建立了邮政总局。有的根据地也建立了邮务局和交通局办理邮政通信。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一部完好的十五瓦的电台。红军的无线电大队成立了。这就是人民邮电的萌芽。当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利用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一些设备，建立了人民的电信通信组织，那时邮电通信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的通信需要，以及

根据地之间、党中央和白区党组织之间的通信需要，也顺便带送工农红军战士的书信。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转战到敌人后方，随着战争的需要，各解放区都相继建立了邮电机构。当时我县隶属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战争条件下，交通（邮政）工作，对打击消灭敌人，巩固发展我党我军力量，支援根据地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党交通（邮政）工作，尤其对冀鲁豫根据地来说，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冀鲁豫根据地地处我国中原地带，西至平汉，东至津浦，南跨陇海等铁路，中贯黄河、运河两大河流，它是联系华东、华中、华北与西北（经过太行到延安）的纽带。我党大批干部（包括一些中央负责干部）来往于延安和华中、华东、中原等根据地之间，我党大批重要机密文件从延安传送到上述地区，都要通过冀鲁豫根据地这个走廊，都要经过地下交通联络网的护送。

为了配合我党我军有力地消灭敌人，在边区

党政系统曾组成一支一千四百余人的交通队伍（据资料记载：当时我县即已组成地下交通联络站情报支站，共有人员三十四人），先后建立二十多条交通线，行程二千多华里，从区党委到各地、县、区、乡、村建立了一套交通（邮政）联络网。广大交通联络工作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持下，他们没有在敌人疯狂进攻面前后退，也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发出的豪迈誓言是：“人在文件在，誓与文件共存亡。”他们日日夜夜，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寒来暑往，忍饥挨饿，凭着两条腿，冒着生命危险，跨越敌人的封锁沟，穿过敌人的碉堡群，爬山越岭，长途跋涉，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保证党的机密文件的绝对安全，秘密交通员只能是单线领导，不准向其他人暴露。在执行任务时，找不到收文机关或收件人，不能出示文件。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一般都化装成商人、小贩、工人、农民、修道士或走亲访友

的，用巧妙的方法把文件隐藏起来。冬天缝在棉衣里，夏天藏在草帽沿上，拾粪的塞在粪堆里，当小贩的藏在扁担头上，也有的钉在鞋底上，或者用膏药贴在皮肤上。

在全国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为邮电职工写下了“人民邮电”的光辉题词，“人民邮电”四个大字，科学地总结了革命战争年代邮电事业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也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邮电部门的性质、任务和前进的方向。

我县的人民邮电事业，据查资料，杨吉（焦书亭）同志是一九三九年从阿阳边区总支书记转到东阿地下联络站任站长的，这说明东阿县在一九三九年或以前就设立了地下联络站。至一九四二年即设立了交通（邮政）局，杨吉同志任局长，至一九四六年由王子和和田维甫分别任局长、副局长，遵照冀鲁豫行署指示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将战时交通局改为邮政局，并赴黄河南东阿

镇接受旧邮。其接受办法是：由原中华邮政局局长仍任局长，战邮局局长充任副局长，与旧邮合并办公，亦监督局务。合并不及三月，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向边区大举进攻，战时邮局即于1946年11月由东阿镇搬回单庄乡沙沃村，至1947年2月由单庄沙沃搬到柳林屯，1947年3月由柳林屯搬到马安村，1947年8月由马安搬回柳林屯，至年底搬来铜城。1946年时，田维甫任局长，有业务员一人，邮工十人，自行车六辆，马二匹，至1948年有局长一人，业务员一人，邮工七人，伙夫一人，自行车六辆，驴一头。隶属于冀鲁豫区邮政管理局六分局领导。从搬来铜城后，曾三移局址至今已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邮政通信网。

搬来铜城后，全县只有这一处邮局，从1954年开始至现在，先后建立了牛店、刘集、单庄、陈集、高集、古官屯、位山、黄屯、大桥、姜楼、姚寨、大李、杨柳等十三处邮电支局，达到了乡

乡设局所，邮件的干线运输由用骡子去聊城驮，现在用上了济南至聊城的自办汽车，县内邮件运输由人背肩挑发展到现在的三轮摩托车，农村投递路线发展到二十四路，都是逐日班，达到了村村通邮。投递路线长度由建国初期810公里增长为1310公里。

我县的电信通信也是从无到有，从土到洋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电信主要设于军队，为军队服务。至1948年8月我县电话五分站由军分区交给县政府建设科管理，建站后第一任站长是姜潜斋，至1950年2月姜调阳谷，从聊城调来张建文同志任站长，至1952年6月张调寿张，由朱志忠同志任站长，至1953年7月与邮政局合并。电话五分站由部队转地方时有职工五人，二十门的磁石式电话交换机一部，有通聊城的直达线路一条。从1953年7月邮政、电信合并，成立东阿县邮电局后，电信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办理电信业务的局所也和邮政一样

遍布全县。长途电话线路49年通聊城一条，至1985年增长为通聊城、济南、平阴、茌平、临清、肥城等13条，并给县委开放了传真电话，市内电话由手摇磁石式发展为纵横制自动电话，电报业务从1954年开办以来，由话传发展到现在的电报电传机，县内电话由1953年接受时的县至区的中继线（单线）五条和区间中继线两条，单机七部，发展到现在的乡乡接交换机共计17部890门，县至乡镇和乡镇之间的中继线路二十二条，131杆公里和257条公里，装有电话机266部。1947年从柳林屯搬铜城后由县政府拨给9间半旧房办公，不足应用就租赁民房。从1956年起至现在先后盖新房6929.01平方米，其中邮电综合楼1805平方米，职工队伍也由1949年的16人增长为1985年的180人。

历史证明，人民邮电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人民政权的诞生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县邮电

事业的自动化程度又有很大提高，通信能力大大增强，基本上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邮电通信网。

注：本文作者，现为县邮电局史志编撰组长。

烟香飘逸吕营村

刘永禹

解放战争时期，吕营烟厂，曾为战争和生活做出过贡献，提供过服务。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一提及它，似乎又嗅到了飘逸的烟香，看到了军民的鱼水深情。

吕营烟厂，原名叫“裕鲁烟厂”，群众习惯称呼它为“金钟烟厂”。一九四六年三月，在济宁建立，为冀鲁豫供给部兴办，归供给商店直接管辖。六月，内战爆发，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济宁东临津浦路，大运河贯通南北，有着极高的战略地位。内战初起，首当其冲。为适应战争环境，免遭敌人破坏，裕鲁烟厂于敌人到达济宁前，主动撤离该地，走向游击化生产。后经郓城、梁山，于九月份辗转来到东阿吕营。

东阿，是个比较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从三

十年代县委初建后，人民就一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和日伪顽进行斗争。即使在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四二、四三年，表面上日伪碉堡林立，实际上领导权还在我党手中。党依靠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改造了红枪会，争取了伪土顽，打击了日本鬼。创出了有敌人，无敌区的特殊环境。正因为这里群众基础好，又有黄河天然屏障，所以烟厂到达吕营后，才结束了游击生产局面，开始在这里安营扎寨，正规生产。

裕鲁烟厂迁到吕营后，因陋就简，设在该村大户刘元成的大院子里，原来的油房，改作烟厂配料加工车间，烟厂经理是阎勉斋；监委邵同尧；保管、会计崔如州；技师史林清。最初有工人二十名，以后又在吕营扩充十名。从领导到职工，没有工资，全部实行供给制。制烟生产设备，也十分简陋。有手摇七根带卷烟机一部，手摇六吋口切丝机一部，还有一些简单的加工土工具。日产卷烟一箱，原装为一大木箱，二百五十

条，五万支。有骡马胶轮大车三辆，是烟厂进出产销主要运输工具。产品主要由冀鲁豫供给商店经销，也兼营小批发业务，少量的由零星商贩供应市场。糊制烟盒、包装等零活，由当地群众承揽。工厂的残次烟，论斤卖给群众，价钱很便宜。工厂依靠群众，群众支持工厂，军民鱼水情深，关系密切，工厂在这良好的环境中，生产蒸蒸日上，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有力地支援了战争，繁荣了市场，为人民生活提供了方便。

鲁烟厂，初时生产金塔牌香烟，后来，出于生产稳定，产品质量的提高，在吕营创出了新牌香烟——金钟烟。金钟烟不但包装新颖大方，牌号通俗易懂，而且质量优良，香味浓郁，很受群众欢迎。至今提起来，赞不绝口，金钟烟在这里尚有广大市场。当年制烟炒料时，香味满村飘逸。金钟牌香烟的声誉，象浑厚宏亮的钟声，响遍鲁西大地，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尔我县人民亲切地称它为“金钟烟厂”，它的真实名

子反倒不响了。金钟烟的创出，对我们当今的工业生产，应该有所启示。草窝能飞出金凤凰，厂子小，设备差，也能创出名牌产品，五十年前金钟烟厂的经验，值得我们今日商品大合唱中借鉴。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城市逐渐被我党解放。繁荣经济，发展生产，成为我党当时的重要任务。散居在偏远乡村的工厂、商店，纷纷向城市集中。裕鲁烟厂，已不适于在吕营继续生产了。于一九四八年二月迁往聊城古楼南路西，结束了在我县一年半的生产。同年四月，与冀鲁豫烟草公司所辖的新华烟厂合并，又迁到聊城东关闸口南。一九四九年八月，平原省建立，聊城归属。烟厂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迁往安阳，就是现在的安阳卷烟厂。金钟牌香烟，今天仍是该厂的一个重要品种。

注：本文作者现任东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东阿私营药业大观

张连启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医药——这个民族瑰宝，对我民族的繁衍生息起着巨大的作用。对于从事医药人员，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应予以正确评价。

医药业在东阿源远流长。历代都有民间医生走街串巷、防疫治病，普救众生，解民倒悬，至清朝，更有较大发展。1817年（清嘉庆二十一年），江西省药商姚文邦来邑经商行医，在杨柳开设“滋立堂”药店，为东阿设堂立店大宗经营药材之始。相继有江西省景德镇俞德宽，河北省武安县李启功，东平县李广业来东阿县经商行医，创立堂号。外地中医中药商家来邑创办中药店铺，带动了地方药业的兴起，地方医生张春华开设了“同仁堂”，姚公昭开设了“积善堂”，

之后，中药店，中药铺（棧）遍及乡里。至民国年初，中药店铺已发展到十七家。其中李启功创办的“广盛聚”、孙立和创办的“泰生堂”、张春华创办的“同仁堂”发展迅速，他们坐堂行医，批零兼营，对东阿县医药市场具有一定的垄断作用。

从1911年（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前夕，私营中药业进入鼎盛时期，西医西药也在这一时期相继传入东阿县。1926年（民国十五年）相继有司德温在东阿县司庄村开设了“济司医院”，杨汝法在东阿县六路口村开设了“春生西药房”，芦延琪在东阿县湖西渡开设了“民望诊所”。由于劳动人民世代以中药煎剂治疗疾病已成固有的传统习惯，加之几处西药房经营的药品多为进口货，舶来品，价格昂贵。所以，西药只是仅仅敲开了东阿县医药的大门，而没有得到普及，也不为人民习惯采用，它的影响远不如中医中药的影响大。据粗略统计，至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东阿县私营中西药店已发展到68家之多，其中私营西药5家。几家较大的批发行栈资金雄厚，财源茂盛，生意兴隆，业务关系遍及川、广、云、贵、江西、河北、河南及东北三省，有些药栈开始配制膏、丸、丹、散投放市场。创建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的“民生药栈”崭露头脚，与牛店镇的“广盛聚”、杨柳的“泰生堂”、张坊的“同仁堂”形成鼎足之势。各种小药店多以这四家批发行栈为依托，用肩挑、驴驮、车推等形式组织进货，寓药于医，医售结合。在这一时期，境内出现了以施诊施药为宗旨的慈善事业和红十字会组织。旧县政府成立了公医所，原名施诊所。创始医生谢功严。公医所以施诊施药为宗旨，所需资金由魏家庄、徐家楼、陈家店、官庄、苦山五集共襄（所谓慈善费）。1926年（民国十五年）由慈善家李洛先、孙宝甫、时雅乐等人创办的红十字会，曾在直皖军阀混战期间，奔赴战场，抢救伤员，保护百姓。1930年（民国十九年）国民

党部队与阎锡山部队在东阿县西部地区发生冲突，红十字会曾在阿城设办事处，并附设医务所，进行营救医治。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战事骚乱，兵匪四起，境内私营中西药业朝不保夕，日趋萧条。

1948年8月，东阿县城解放，在党和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指引下，私营药业获得了新生。至1949年建国前夕，中西药店（铺、栈）已发展到105家（注：其中包括国营医药商业之前身——大生药栈。不包括1946年东阿民主县政府成立的济众医院和东阿县贫民医院）。其中私营西医诊所（药房）7家。

建国后，东阿县政府于1950年成立了医联会，1953年成立了东阿县卫生协会，吕玉成任卫生协会主任，刘瑞兰任副主任。卫生协会成立后，对全县私营医药商业的从业人员进行技术考

核，考核合格者准予行医，经营；不合格者令其弃业务农。当时经考试合格的医生300余人，分布全县乡里。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私营药店有的弃业务农，有的归为联营诊所，有的资产折价归县供销合作社。至1956年，私营药店逐步纳入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从1817年（清·嘉庆二十一年）至1949年，境内主要私营药店（铺、栈）大体情况如下：

广盛聚药栈（1860—1954）

广盛聚药栈创建于1860年（清·咸丰十年），掌柜李启功、河北省武安县人。

广盛聚药栈设于东阿县牛店镇东街，设立初期门市5间，仓库和加工房8间，是一个前店零售，后店批发、加工，三位一体的批零兼营中药行栈。设立初期，李启功从河北省武安县带来店员3人，是时，李启功年仅二十四、五岁，精明强干，会做生意。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店内不用当地人，故全部店员均来自河北省武安县一带。

为了充实货源，以药品的品种齐全，价格便宜占领市场。他采取“联购分销”的方式购进各路药品，以补资金不足。“联购分销”可以称之为他经营药店的最佳方式。“联购分销”即联合河北省至东阿县沿途十几家“广盛聚”商号，统一筹集资金，统一派人外出采购，购进的药品按自筹资金的多寡分销进货。由于采用“联购分销”，购进药品的费用低，各路名贵药材品种多，质地好，价格便宜，从而发展迅速，占领了市场。方圆几十里内的中小药铺，纷纷前来进货，生意兴隆，颇有名声。“广盛聚”的进货渠道主要有：北方产的人参、鹿茸、细辛、黄芪、甘草等，多从祁州（河北省安国）购进；川芎、当归、云苓、木香等，多从樟树（江西省）购进；菊花、山药、生地、红花等，多从亳州（安徽省亳县）购进；麝香、牛黄、硃砂、冰片等，多从川、广、云、贵等地购进。为补充货源不足，也兼而收购一部分本地产的中药材。

大约在1909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间，李启功年过花甲，告老还乡。此后，梁文贞继任掌柜，梁文贞重视柜台艺术，讲求和气生财，尤其饮片加工严格遵书炮炙，一丝不苟。并配制膏、丸、丹、散投放市场。因此，批发业务越做越活，名声越来越大，房产增至二十余间，店员增至24人，年销售中药材6万余斤，经营额10万余元。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日本侵略军占领牛店镇，广盛聚的房产、药材被烧光。至此店员失散，药栈倒业。

东阿县解放后，梁文贞于1945年重振家业，恢复广盛聚药栈。但批发业务已无元气，经营以零售为主。至1947年店员仅发展到4人。建国后，该栈过渡到联营诊所。

同仁堂药栈（1844—1953）

同仁堂药栈创办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店主张春华，东阿县张坊村人。

同仁堂药栈创建初期，设在孟村，实为中药

店，店主张春华行医兼零售，主治内科，善诊瘟疫。1855年（清·咸丰四年），迁址黄胡同，开始主营中药材批发业务，兼诊病，售药。此时的药栈为合股经营，全部股金张春华占两股，同村乡邻张希元、张生平占一股。全栈共有五人，掌柜张春华，座堂医生芦学义，学徒黄连廷、崔王安等。门市3间，库房兼作坊6间，厨房1间。资本约1300块大洋，年销售中药材2500块大洋，红利600块大洋左右。经营中药材500余种。

货源渠道：主要从河南省的彭德府（安阳）、安徽省的亳州（亳县）、河南省的禹州（禹县）、济南府德兴隆药行、广德栈和德庆药栈。商品运输主要靠马车、驴车来往济南靠黄河水路航船。

批发结算采取现金交易和药品赊销两种形式，为了与其他药栈竞争，批发药品的价格比较灵活，一般在现行价格的基础上九五让利，也就是说买他100元的药，仅收95元；大宗药品的销出，还有低于九五的。由于经营灵活，价格便

宜，方圆30余里，近70余家中小药铺多从此栈进货。

1924年（民国十三年），张希元、张生平两人的股金退出，同仁堂药栈由张春华独资经营，随迁址于张坊村。迁址本村以后，张春华之子张广盈任掌柜，后，张广盈之子张希兰接续。张希兰任掌柜期间，其长子张云敬座堂，三子张云玺帐房先生，次子张云亮农忙时耕作，农闲时饮片加工，年终负责催帐。此时，同仁堂药栈的经营特点是半农半药，全家经营，不用外人。不管农忙或农闲之时，每天晚上全家人都搞饮片加工，为了多销一些药品，经常到中小药店登门售药，在当地颇有信誉。

1947年土地改革时，同仁堂药栈的全部财产无偿地归了村农会，1948年农会又把全部财产退给张希兰，退回后继续营业，并增加中成药20余种。1953年全部财产作价归了联营诊所。

泰生堂（1862—1952）

泰生堂创建于1986年（清·同治元年），店址设在东阿县杨柳南街，店主由孙立和、孙化常、孙绪禄祖孙三代相传。

孙立和为第一代座堂先生，主治妇科，方园二十里小有名气。初期行医兼零售，后发展为批零兼营和医售并举。全店共有3人，年经营额3000余元，红利900余元，经营中药材350余种。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进入兴盛时期，年经营额4500元，红利1350元。

所备药品主要从济南府千佛山药会、德顺栈和天德生药栈组织进货。批发结算方式采取现金交易和药品赊销，年终收帐。

1952年，全部财产折价归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民生药栈（1931—1953）

民生药栈创建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栈址设于东阿县曹庙村，店主相继为曹立亭、曹立轩。

民生药栈是东阿县私营药栈的后起之秀，创栈时间较晚，发展较为迅速，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该栈主营中药材批发业务，民房8间，店员3人，资本4000元，年经营额6000元以上，红利1500余元，经营中药材品种450余个。

1948年民生药栈分为两处，曹庙村一处，红庙村一处，各有3名经营人员，中药材增至500余种；中成药30余种其中以六神丸、唐时义药丸、疳积散为主。1948年东阿民主县政府已经成立了大生药栈，这是国营医药商业的前身，民生药栈为了与大生药栈竞争，重视加工炮炙，并经常组织力量到药铺进货，赶大集设摊售药，在附近有一定的信誉，这一时期年经营额8000元，年红利2000元。

货源渠道主要从济南福兴泰药栈组织进货，批发结算除采取现金交易和药品赊销以外，还以粮药兑换的方式扩大交易。粮药兑换主要以中药材兑换小麦，小麦的价格按当时行情的现行价进

行协商。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1953年全部财产折价归联营诊所。

注：本文作者，现为县医药史志编撰负责人。

东阿方志述略

王桂云

地方志可为文史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是一个行政单位的历史著作，是一定地域里社会、自然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作。举凡一地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灾异等等，皆包罗在内，被誉为“一方之全书”，

“地方百科全书”。方志强调“贵乎致用”，为现实服务。“述而不作”，不作议论之文。所以典籍丰富、资料性强，除具有一般历史学科的特点外，还具有普及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影响非常广泛。

东阿为古邑。县为古东阿、谷城二邑。北齐省谷城。明初迁县于谷城镇。清雍正以来属泰安府。《寰宇记》称贡阿胶出于阿井即在古县城。有关记述东阿县的方志，有《山东通志》、《东昌府志》、《兖州府志》、《泰安府志》、《东平州志》等，现仅就东阿县志略述如下：

明志有二修，在弘治年间和万历年间，间距八十余年。

〔弘治〕东阿县志：（明）秦昂纂修，昂字民望，弘治庚申①时任东阿县知县。据清《道光·东阿县志》载有明弘治十三年（1500）进士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石淙②人杨一清撰序。还据明《〔万历〕东阿县志》由进士出身的光禄寺卿，峰阳③人贾三近撰序称：“东阿有志不详，其所由始弘治间、秦令昂修、杨文襄公有序，迄今八十余年，中间故实脱略，篇章残缺，览者病焉④”。由此得知县志创修于明弘治十三年（1501），原志早佚⑤，其况不详。⑥

〔万历〕⑦东阿县志：（明）朱应穀⑧纂修。应穀字德载黎阳⑨人，进士出身，万历壬午（1583）时任东阿县知县。卷首有贾三近撰志序云：“黎阳朱君德载，以进士高第来宰阿⑩，才猷敏茂，多奇树，历三载，政成民怀，百废俱兴，暇中览邑乘⑪，叹曰：阿固两都通津，

山左雄区也，其疆域陵谷往躅（十二），遗文散见于史传，及学士大夫谈说间，要不勘矣。而旧乘所载廖廖，若此千百年文献缺，然记述曷称观视哉（十三），令邑人太史于君可远，柱史孟君祠孔，方家居具良史才，朱君就谋之乃以编摩托二君，而躬率诸文学士为纂集其事，越三月而志告成，始方域终艺文，凡十二卷，将梓以传于君，于余为同年友，函志驰书山中，嘱余序，诸间端。余受而读之，见其四表八志，一取裁于司马迁，而纪事丛谈间，折衷于左氏，驰骋古今，包罗图史、吏治、民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阅情雅畅（十四），哀然（十五）成一邑全书。视旧所辑录，不啻户口千百矣……顾此邑乘，又其绪余尔。古称三不朽，谓立德立功立言，于孟二君，大雅宏达，勒成邑史，为千年之信书，朱侯以惠政得民有功德于兹士，而雅意邑乘皆不朽事也，余固不辞而乐为之序。”原志已不存，仅知县志为十二卷，由知县朱应穀纂修，贾三近撰序，实际是

志为于慎行所纂，于明万历十年（1582）刻，据清道光志凡例得知康熙两次重修皆仍万历之旧版，万历志实于慎行等撰也。

清代为地方志发展史的鼎盛时期，自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修志，促使方志有很大发展。东阿县志四修：

〔康熙〕（十七）东阿县志十二卷：（清）刘沛先纂修。沛先嘉陵人，清康熙四年时任东阿县知县，参修二十三人。志叙有清康熙四年进士、东平人陆从柱、知县刘沛先、儒学刘进吉等撰序，原序有明弘治进士杨一清、明万历贾三近撰序。凡例六则。列图为县境、县城、县治、学宫、安平镇等五幅。县志为万历志之版增修。志目同前：卷一方域志：沿革、分野、疆域、山水、河渠、古迹、风俗、物产；卷二建置志：城池、官署、行署、属署、祀祠、仓场、铺舍、桥梁、寺观；卷三职官志：官师表、统属表、封建考、列传；卷四赋役志：户口、里甲、贡赋、均徭、马

政、兵防、盐法、税课、河道、驿传；卷五选举志：科贡表、武职；卷六至七人物志：前代人物史传、明朝人物列传；卷八记事志：政记、丛谈；卷九至十二艺文志：诗赋、碑记、志铭。是志清康熙四年（1665）刻，四册，约为十五万字。是志体例完备，由于慎行撰的万历志基础较好，因而，是志继承了前志的传统，尤以艺文志辑的文献尤丰。

〔康熙五十六年〕东阿县志十二卷（清）
刘沛先原修，郑廷瑾增修，苏日增增纂。沛先嘉陵人，清康熙四年时任东阿县知县；廷瑾清溪人，清康熙五十六年时任东阿县知县；日增邑贡生。参修二十九人，卷首有吏部尚书安溪李光地、兖州知府金一凤、邑人张令璜，知县郑廷瑾等撰序，邑人秦奕洗撰跋；还有原志序跋杨一清、贾三近，陆从柱、刘沛先等撰。据道光志凡例云：康熙两次重修皆仍万历之旧版，万历志实为于慎行等撰也。列图为：县境图、县治图、

学宫图、安平镇图。志目为：卷一方域志：沿革、分野、疆域、山水、河渠、古迹、风俗、物产；卷二建置志：城池、官署、属署、祠祀、仓场、铺舍、桥梁、寺观；卷三职官志：官师表、统属表、封建考、列传；卷四赋役志：户口、里甲、贡赋、均徭、马政、兵防、盐法、税课、河道、驿传；卷五选举志：科举表、武职；卷六至七人物志，前代人物史传、明朝人物列传；卷八记事志，政记、丛谈；卷九至十二艺文志，诗、碑记、志铭。艺文志录有以于慎行撰著居多。是志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六册，约为十八万字。基于康熙前志，微有增添新内容，仍保持前志风格。

〔道光〕（十八）东阿县志二十四卷卷首一卷（清）李贤书修，吴怡纂。贤书河南嵩阳人，进士出身，清道光九年时任东阿县知县；怡云南保山县人。监修志书为进士出身的泰安府知府，福建人杨惠元，还有三十三人参修。卷首有李贤书

撰序称：“志者何？记事也。县志者，记一县之事也。”录旧志序多篇。有明弘治十三年杨一清、明万历十年贾三近、清康熙四年进士弟侯选推官，东平人字冲默陆从柱，东阿县知县嘉陵人刘沛先，历任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安溪人李光地，清康熙五十四年东阿县清溪人郑廷瑾，清康熙五十六年山东兖州府知府山阳人字紫庭金一凤等撰。凡例十六条称：“旧志原本为前明于孟一史，手订四表八志，言简事赅；国朝康熙间两次重修，皆仍其旧板增添数页，至列于孟二公于人物补殊乘，体俟此番旧板已不堪用，且朝代已更，制度之因革互异，气运之往复顿殊，谨照通志府志另行纂辑，非敢变更前规”。图为：县境全图、县署图、文庙图、武庙图、大小清河图。继录列圣诏旨，均为清代各个皇帝对东阿的诏旨。志目为：卷一天文志，卷二方域志，卷三山水志，卷四古迹志，卷五建置志，卷六田赋，卷七学校志，卷八祠祀志，卷九封建志，卷

十官师志，卷十一宦迹志，卷十二选举志，卷十三至十四人物志；卷十五至二十二艺文志；卷二十三祥异志；卷二十四杂记，仙释、方技、丛谈、近事。县志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突出特色就是内容充实。艺文志所列八卷，占全志的三分之一，其中收录了官宦出身、邑人于慎行大量诗文。县辖安平镇，即张秋镇，在元为景德镇。商贾辐辏，兵革屡经，视县治尤重焉。县志有引张秋志之文，惜未见其书。于清道光九年（1809）刻，又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由济南午夜书店铅印刊行时，有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为志书封面题字。八册，约为四十六万字。

〔光绪〕东阿乡土志八卷 （清）姜汉章等纂修。汉章邑贡生撰志序云：“朝廷之盛典编纂志乘，乃学问之要图。现值教育，宏开陶镕。”又云“在童蒙尚少知识”之时，不能忽视“良知良能之学习机会，不能只读诗文，应开扩知识面，应从乡土知识开始”。县志列目为：卷一历

史；卷二政绩录；卷三兵事录；卷四人类、户口、姓氏；卷五宗教、实业；卷六地理；卷七山水、道路；卷八物产、商务。县志于清光绪年间铅印，一册，约为二万五千字。

乡土志是清末新兴起的一种普及本的缩编志书。它的大量产生，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有关。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后，丧权辱国，日本割台湾，法国强租胶州湾，英国强租九龙半岛与威海卫，国势日衰，意欲图存，便实行新政。为此，在学习先进科学知识之外，便要求培育人们，爱乡里爱国家的思想。增强人们的爱国心，必须从培养乡土观念着手，乡土志就是最好的乡土教材。从东阿县乡土志里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精神。

〔民国〕东阿县志十八卷 周竹生修，靳维熙纂。竹生莒县人，民国二十一年时任东阿县县长；维熙字约斋，聊城人，清代遗老。其祖靳辅为清康熙时任河道总督。他于光绪戊子科优贡，

肄业尚志堂，以文学知名，世传治河方略，受知于山东巡抚张曜、奏保教职。甲午夏五月，署莒州学正，课士循循善诱，兼理日照县教谕训导，科举停，设校士馆，高等小学堂，历膺馆长堂长，旋调升沂州府中学监督，斯时学制革新，士习仍旧，长吏器其才，兼派充莒州统计处总办，《山东通志》莒（县）日（照）沂（临沂）采访员，《〔宣统〕重修聊城县志》任总纂，俸满以知县用。宣统辛亥秋，解俎归里。民国后，终老不仕，主纂是志。享年八十岁，公谥孝恭先生，著有《竹虚石可轩诗文偶存》。参修七十九人。卷首有：山东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河北清苑县人李树春，教育厅厅长菏泽县人何思源为总裁。周竹生撰志序云：“奉令纂修邑乘，曾于续志竣时为序弁。”列图有：县全图、县城图、学区图。凡例十六则。志目为：卷一至四舆地志：疆域、沿革、形势、疆界、城镇乡村及户口、气候、物产、灾祥、山水、河渠、堤埝、建置、城池、公署、

局所、会所、庙学、坊表、坛庙、祠祀、渡口、胜概、邑景、古迹、古墓；卷五至十四政教志：财赋、田赋、附捐、杂税、盐课；民治：村自治、县自治、县民生活概况、县民品格概况；实业：农业、林业、工业、商业；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交通：路政、汽车、电话、邮政、电线；救卹：药局、工厂、红十字会；武备：警团、大队部、兵事；礼俗：祠祭典礼、乡风家礼、风俗；乐制：乐器、乐章；吏职：县长、党员、法官、警察、管狱员；卷十五至十七人物志：选举、学位、公职、武职、议员；耆旧：文学、忠义、卓行、侨寓；列女：贤淑、贞烈、节孝；卷十八艺文志。县志于民国二十一年修，于二十二年（1934）由济南午夜书店铅印，四册，约为二十万字，与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十六卷合套。

〔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十六卷卷首一卷 周竹生修，靳维熙纂，参修五十七人。山东省教育

厅长何思源和省民政厅长李树春撰序。志目为序、姓氏、凡例、图。卷一天文志：星野；卷二山水志：黄河考、汶水考；卷三兵事志；卷四古迹志：丘墓、金石；卷五田赋志：户口、地亩、存留、税课、人丁、贡赋、耗羨、盐法；卷六学校志：职贤封号、儒先姓氏、从祀年月；卷七祠祀志：大祀庙制、礼仪祭器；卷八官师志：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训导、营管、杂职；卷九宦迹志；卷十选举志：征辟、进士、武进士、举人、武举、五贡、例贡、封赠、荫袭、广额、大宾、劳迹、捐纳、屯官；卷十一至十二人物志：乡贤、文学、武功、政绩、卓行、孝友、忠义、侨寓、列女；卷十三至十四艺文志：著述、制诰、奏疏、禀、告示、书、辨、铭记、序、跋、传、墓志、赞、歌、诗；卷十五祥异志；卷十六杂记、方伎、丛谈。尽管周竹生在序言里强调县志之新：“至于共和肇造党国柄政，肇兴革绪大端，特别为党元新志，以纪其盛，维

不与旧志同凡例也。”然而，在志内的《凡例》中，却称：“兵事前志不载近自咸丰初年，发捻幅匪相继扰乱，城郭为墟，公民抗义捐驱者近达六千余人，诚未有之浩劫也，特纪之。”其将农民起义之太平军，捻军和幅军，均称为匪，其因袭旧志的观点，可见一斑了。何有新字可言呢？这是民国志的通病。县志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济南午夜书店铅印，四册，约为二十万字。曾与民国东阿县志十八卷合套。

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时代的前进，旧方志的体系有了新的突破。从上述两志可以看出，增加不少新内容，如政教志里设有：民治、实业、教育、交通、救卹、武备、吏职等，全是当代新增事物。

乡镇志，是记县以下一乡、一镇范围的方志。初见于宋代，明清时期数量大增。东阿县的〔万历〕安平志和〔康熙〕张秋志，就是这类志书。

东阿县自明弘治十三年（1510）始，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止，不足四百年间，县志有六次纂修，其连续性是可靠的。东阿县志书的丰富，这与志书的创修基础好分不开。那就是明代于慎行所作的贡献。于慎行字可远，后更字为无垢，邑人（祖居杨柳），十七岁时中举，明隆庆二年进士，后任编修。万历初年，充日讲官，后至东阁大学士，为人刚正不阿。万历十八年正月，因疏请早建东宫出阁讲谈一事激怒了皇帝，对其“严旨诘责”，并被夺俸。最后，只好“引罪乞休”，于慎行免职回乡后，万历十年参修县志。后来，当时兖州府郡守易登瀛，卢学礼二公相继邀请他主持修志，于万历二十年参修兖州府志。他博古通今，官至礼部尚书，朝里很多大礼多由他一手裁定。他还精心校勘过若干书籍，对于经学、史学、地学、考古学、音韵学都有精深的造诣。由他主修的府志和县志，都是认真负责的。他在修志过程中，首先进行文献资料的征辑，采

取“旁搜博采，属词比事”的方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在编纂过程中，他呕心沥血，一丝不苟，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历览了郡州县各地有关地形、关隘、赋役、水利、交通、矿产、农政、手工业、御倭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资料，悉行摘录，以资考核。对于每一种资料他都要“检故实躬，校行搜罗”进行精心分析。凡属方志之一体者，悉行甄录。由此可见，于慎行修志的功绩是颇著的。东阿县各志，于氏文稿收录颇多，几乎占艺文志的一半。

过去东阿县的志书，较他县为上，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东阿的宝贵财富，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一、弘治庚申：弘治，明朝孝宗皇帝朱祐堂年号，他主政十八年（1480—1505）。庚申乃干支纪年。弘治庚申为公元1500年。

二、石苻：地名，今河南登封。

三、峯阳：春秋战国，楚立陵邑，元省县入州，明降州为县，属山东兖州，今属邹县。

四、览者病焉：览者，指读者。病焉，指责批评。因为旧志故实脱略，篇章残缺，读者指责。

五、佚：y 意。散失；弃置。原志早佚，指弘治县志早已散失。

六、其况不详：指弘治东阿县志的内容不知道。评，评察。

七、万历：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他在位四十八年（1563—1620）十岁即位，初由张居正执政，改革政治，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治理黄河，国势渐强。亲政后，不视朝政，大力营造，挥霍无度，1596年，激起人民反抗。

八、穀：gǔ 古，推穀，推荐的意思。这里是指明万历时东阿知县朱应穀，进士出身。

九、黎阳：地名，汉置。黎山在其南，河水经其东，取山之名，取水之阳故名。今日河南浚县。

十、宰阿：宰，主持，主宰。阿，东阿。即主政东阿之县令。

十一、暇中览邑乘：闲暇之中。览，看。邑，县。乘，记载。邑乘，即一县之史书记载，乃县志。

十二、躅（zhú 竹）踪迹。往躅。过去的事。

十三、然记述曷称观视哉：然，但是，可是，然而意。记述，指县志记载表述。曷（hé 褐），何以，观视，看法。

哉，呢。老县志残缺不全，怎么叫后人去观看呢？

十四、闳情雅畅：闳情，宏大，指文章内容丰富。雅畅，指文笔优雅流畅。

十五、裒然：（攷又剖）聚集在一起。

十六、不啻：（彳，翅）啻，相等。不啻户口千百矣，比户口册子还详尽千百倍。称赞县志之完备。

十七、康熙：清圣祖玄烨的年号，八岁登基，在位六十一

年（1662——1722）文治武功都较好，1683年统一台湾，派兵屯守。

十八、道光：清宣宗景宁年号（1821——1850）是鸦片战争投降派头子，与英、美、法多次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东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作者 =

页数 = 165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